

# 清末上海教育改革之研究

施扣柱

清末实行新政，教育改革是颇为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其中尤以上海为典型。由于不同于其它地区的人文地理、历史文化传统诸因素的作用，清末上海的教育改革扮演了领航者的角色，对彼时和其后的继续改革均影响甚大。这是上海渐成全国文化中心的重要表征。清末上海教育改革意义之重大、内涵之丰富，足堪著为专书。本文仅就其背景、内容、影响与作用略作研究。

## 一、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背景

开埠和租界设立以后，上海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使上海具备了近代改革场的地位。挟坚船利炮而来的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强行楔入，瓦解了上海传统的封建小农经济，促进了上海城市由古典型向近代型的转化，催生出上海也是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第一批民族资本家以及早期的近代型知识分子，<sup>①</sup>为近代上海的社会变革（包括教育变革，下同）造就了可观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力量。基本上实行西方制度的外国租界的设立，一方面伤害了中国人的民族感情，损害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对上海和中国实行了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助长了某些腐败的社会风气。另一方面也在客观上引进了涉及物质、精神和制度诸方面的西方文明，有利于中国人的进步活动，促使上海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和西学传播的基地，促成了上海人的近代世界观念、价值观念、民主观念、科学观念、市民意识和竞争意识，<sup>②</sup>为近代上海的社会变革提供了直观的示范和必要的社会心理基础。

上述背景对一般社会变革是重要的，对教育变革也是重要的。然而，清末上海教育改革的得天独厚之处在于：它还同时具备了其它几个直接相关的有利因素。

第一、几与开埠同步的、地方性的、自发的、分散而无系统的教育改革实践。早在开埠后第六年，1849年，上海就出现了第一所由外国教会创办的学校——徐家汇圣依纳爵公学，从此开始了外国教会和外国侨民在沪办学的历史。至19世纪末，这样的学校至少开设了47所。<sup>③</sup>与此同时，上海地方政府和华人先觉者也都着手开办新式学校，同期内创办数约18所。<sup>④</sup>为便于研究，人们一般将上述学校区分为外侨系统和华人系统，其划分标准是按创办人的国籍而定。实际上，这一时期，在沪外国差会、租界当局和华界地方政府都没有进行过自觉的教育行政规划与治理，新学校的创办在整体上呈无序散在状。不仅两系统间不相统属，其内部各学校间的

<sup>①</sup> 陈正书《租界与近代上海经济结构的变化》，《史林》1988年第4期。

<sup>②</sup> 熊月之《上海租界的双重影响》，见《上海史研究》二编，学林出版社1988年版；《中西文化的碰撞、认同与排拒》，见《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sup>③</sup> 李清悚、顾岳中《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教育侵略活动资料简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2年版，第32、34、77、78、80-82、85-89、92-94、96、112-113、116页。

<sup>④</sup> 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上册，第214、468、471、488页；下册，第598、859-861页。

级别、类别划分亦不甚明了，并没有形成近代学制系统所应有的纵向衔接、横向沟通的有机联系。特别是由于缺乏自上而下的全国性教育改革大背景的依托，不少人对科举仕途依然存侥幸之心，给新学校的创办更是带来了直接的不利影响。尽管如此，这些学校仍属于近代新教育的范畴，或处于向新教育过渡的阶段。它们大体上或多或少地开设了一些外语和声光化电之类西学课程，以及缝纫、烹饪、园艺之类实用课程，采取了比较形象生动、循序渐进、注重理解的教学方法，比较注意发挥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尤其重视体育锻炼，在个别学校内部还出现了不同教育阶段的划分。至于女子学校的创办，更是为传统中国所无。所有这些，都与中国传统教育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刺激了国人的觉醒，起到了开教育新风气的作用，提前释放了清末大规模教育改革时期可能产生的社会心理震荡。它所积累的一些办理新教育的经验，为清末上海学堂提供了直观的参照。它培养的若干人才，为解决新型师资的燃眉之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世纪下半期新教育的初步活动，为清末上海教育改革奠定了相对风气未开或风气迟开地区较高的起点和基数。

第二、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1905年发轫的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其实质是通过上海华界地方事务的振兴，促进整个国家的近代化建设。教育改革作为地方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关注。无论是城厢内外总工程师局还是城自治公所，对清末上海的教育改革都倾注了相当的努力。它们采取单独办理、和劝学所联合办理、以及督促劝学所办理的不同方式，进行了重划学区、调查学龄儿童、推广初等教育、社会教育和警察教育等多种活动。<sup>①</sup>由于城厢内外总工程师局和城自治公所均拥有部分地方行政权，劝学所则是地方教育行政机关（详见本文第二章），以上这些学务办理便具有一定的整体性。此外，上海各级地方自治机构还参与直接办学，所办理的学校有小学（8所）和巡警学堂等。<sup>②</sup>自治运动的中坚人物也纷纷以个人名义投入兴学活动，仅县级自治机构曾任议事会议长和董事会董事的45名主要人物中，就有60%与兴学直接有关。他们独自或参与创办、任费捐银和任职的学校约有35所，任主要职务的地方教育行政机关、教育辅助机构或学会团体约6个。<sup>③</sup>需要注意的是：参与清末上海地方自治运动的成员主要是近代商人和向近代商人转化的绅士。前者由于其经济活动的方式，不仅雄于资财，而且富于社会联系；后者则除这些优势外，还与未转化的士绅阶层和官僚保持着先天的密切联系。由于具有这些特点，地方自治机构及其成员的参与兴学，不仅带来了一定的规划性、整体性，而且便于化解旧势力的怨愤与敌视，有利于吸引师资、生源和经费投资，在新旧教育

<sup>①</sup> 《上海市政的分治时期》，见《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1237-1238页。

<sup>②</sup> 吴馨、姚文柟纂《（民国）上海县续志》卷10学校中，民国7年上海文庙南园志局刻本，第2、3、6—7页。《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师局一周年大事表》，光绪卅二年，1张。又，《上海市政的分治时期》记城自治公所设立校数有误，本文不以为据。

<sup>③</sup> 综合下列资料：《（民国）上海县续志》卷9学校上，第8-9页；卷10学校中，第1-2页、14-17页、20页；卷11学校下，第1、5-11、15页。潘忠甲等修，姚文柟、秦锡田等纂《（民国）上海县志》卷9教育，1936年丙子春铅印本，第14页。上海市市立飞虹模范小学编《飞虹模范小学40周年纪念刊》，上海该校，民国33年版。上海市市立养正小学校编《上海市市立养正小学校卅周年纪念册》，民国20年版。敬业中学编《上海市立敬业中学、上海市立敬业中学附属小学35周年纪念特刊》，民国26年版。上海中学实验小学编《上海中学实验小学25周年纪念册》，民国17年版。上海民立中学编《上海民立中学30周年纪念刊》，民国22年版。上海孤儿院编《上海孤儿院报告》（光绪卅二年七月至卅四年六月止），光绪卅四年版。《上海孤儿院报告》（自戊申七月迄庚辰十二月止），宣统2年版。曾志恣等编《上海贫儿院第一次报告》（自开办至宣统元年六月止），宣统元年版。

大规模变型转轨的过渡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三、文化出版界的导向与督促。近代上海的文化出版事业素称发达。庚子国变后，随着开启民智、普及教育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历史地位，教育改革日益成为上海舆论界关注的重心，导致了出版物的新变化。这些变化不仅表现在清末 10 年和开埠以后 50 余年相比，上海新设报刊杂志绝对数增加了 31 种，年平均新设数增加了 9.66 种。<sup>①</sup>更重要的是表现在教育（学务）专栏的开辟、专业教育杂志的问世和教育类著作在同期全国同类书籍中占有较大的比重。清末 10 年间，上海报刊杂志开设教育（学务）专栏的为数不少，主要有《东方杂志》、《普通学报》、《大同报》、《大陆报》、《女学报》、《华商联合报》等等。这种专栏的开辟，并非单纯版面安排上的技术性变动，它的意义在于将原本分散的有关教育改革的宣传报道或论述凝聚为相对集中的信息群，增强其社会吸引力和感染力，扩大教育改革的社会影响。专业教育杂志比较著名的有《教育世界》和《教育杂志》，前者具有历史开创性，后者则发行时间久，在教育界影响较大。它们的问世标志着教育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问，也为上海的教育界提供了探讨和研究的专门园地，有利于教育改革的深化和提高。关于教育类译作的比重问题，大致情况是：清末 10 年间，上海一地出版的中译日文教育类书籍 96 种，在同期全国同类书籍中占 51.34%。同期外地出版的同类书籍为 62 种，占 33.15%。另有中国留学生在东京出版的 29 种，约占 15.51%。<sup>②</sup>上海在译介外国教育类书籍方面居于领先地位。考虑到当时留日学生出版的书籍往往以上海为总发行处，则清末上海能够阅读到的教育类译作当为数更多。这些情形反映了当时上海在全国的文化中心地位，同时又使上海的教育改革有幸得着比外地更多的理论指导，对上海在这场改革中得居先导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清末上海的教育改革，正是在上述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背景中出台的。整个改革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整体性、平稳性、独创性、科学性与民主性，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若干盲点与误区。其间的得失利弊与主次轻重，很值得探讨。

## 二、地方教育行政体系的创立与学区制的诞生

上海地区自元代建县，历来只有学官而无独立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学官分教谕、训导，一般额设各 1 名（除 1646 年裁撤训导 1 人）。教谕的任务是掌文庙祭祀，以儒家经典教育县学在学生员，并负责对全县生员（包括在学与家居散学者）的考核与监督。训导则为教谕之协助，

<sup>①</sup> 综合下列资料统计之：胡道静《上海的日报》，见《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 2 卷第 1 期，第 193-198、203-205、207-210、214、216、219、222 页；《上海的定期刊物》（中），见《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第 1 卷第 2 期，第 539-540、542、544-545、547、554、593 页。《清季重要报刊目录》，见《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群联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78-80、84-85、88-89 页。阿英《清末小说杂志略》，同上，第 104 页。冯自由《辛亥前海内外革命报刊一览》，见《革命逸史》第 3 集，转自《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二编，群联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277-278、281、285 页。《清末民初京沪画刊录》，同上，第 294-300 页。《近代上海城市研究》，第 926—929 页，1039—1040 页。

<sup>②</sup> 谭汝谦主编《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80 年版，第 11、29、38、42、65、69、73-74、80、82、84、90-92、96、98-100、102、111、113、115、118-120、122、125、127、161、166、168、183、198、251、274-302、338、349-350、353、362-363、384、392、405-409、411-415、417、422、426-427、431、440-441、444-445、472、476、478-479、496、503-504、510-511、518、543-544、547、549-550、554-556、578、607、642、652、656 页。

地位略次之。教谕、训导本身一般也是科举出身。显然，学官制是服务于以科举考试制度为中心的中国传统教育的。

上海开埠以后，外国教会和少数先进华人陆续兴办了一些新式学堂，这些学堂开始引进一些西方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在中国传统的古典教育体系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古典式职责混一、政教合一的学官制显得有些不敷适应了。

庚子国变后，清廷被迫实行自我改革性的新政，在教育方面明令废除科举，兴办学校。服务于科举制的传统的教育行政丧失了最后一点存在理由，因而也在改革之列。但清廷教育行政改革的目标首先是中央和省级范围，1906年5月以前，地方教育行政的改革尚未列入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海由于得风气之先，新政中新式学堂发展特别迅猛，仅1901-1904年，新办的各种新式学堂就不下49所。<sup>①</sup>办理和继续发展新教育的需要，促使上海教育界主动着手于地方教育行政的改革。1905年11月，姚文桢等发起阖邑学务公会，联合城乡学员大会于明伦堂，以投票方式选举职员，组织成立了上海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上海县学务公所。所中事务分为三部分，一为文案，一为财政，一为师范。并相应设员三名，即以阖邑学务公会选出的会长任学务公所的总理兼文案员，副会长任协理兼财政员，另推1人任师范监督。上海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设立，在时间上比有关部章整整提前了6个月，它不仅一般地表现了上海教育的超前性与独创性，而且具体地标志着上海教育较早地摆脱了中国式政教合一的藩篱，也使上海教育较早地获得了保持相对独立性和有序性的可能，为教育的近代化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在上海教育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学务公所成员以投票选举方式产生，和各成员间的职责分工与合作，也是上海地方教育行政的重要特色，它们体现了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比起古代学官由官长任命、职掌分工不明的状态，无疑具有历史的进步性。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进步性不仅表现在学务公所诞生之际，而且顽强地保留在《奏定劝学所章程》颁布之后。

按《奏定劝学所章程》的规定，地方劝学所的机构设置相当简单，劝学所只设总董1员，由县视学兼充，在地方官监督之下，综揽全县学务。总董下设各学区劝学员，劝学员的职责是商承总董，调查、劝令本管区内筹款兴学事宜、讲习教育、推广学务、宣讲教化民众以及讲绘本区学务图表报明本城劝学所备案等。<sup>②</sup>上海由于学务特繁，视学须周历各乡，不能常川驻所，曾拟请视学、总董分而任之，被认为“不合部章”而未能获准。上海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机构并不罢休，继续寻求新的解决方案，几经周折，结果采取了如下变通办法：总董与县视学仍以1人兼，但增设协董2人，总董的视学职务可于协董中委托1人代理，另一名协董分工经管财政。这种办法，表面上维持了部章规则，实际上坚持了上海原议中的分工合作精神，体现了灵

<sup>①</sup> 综合下列资料：《（民国）上海县续志》卷9学校上，第9-11、13、17-20页；卷10学校中，第1-2、5、7、9-11、13-14、16-19页；卷11学校下，第4-6、8-9、11页。上海劝学所调查《宣统二年分上海学堂一览表》（庚戌十月止），第3、6、9页。《东方杂志》第1年5期、教育、各省教育汇志，第121页；第1年第10期教育、各省教育汇志，第237页；第1年第11期教育、各省教育汇志，第263页。许晚成编《上海大中小学校调查录》，龙文书店，民国24年版，幼稚园之部，第5页。《上海市市立养正小学卅周年纪念册》第1页。何晓夏主编《简明中国学前教育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94页。汤志均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版，第565、581页。

<sup>②</sup> 《学部奏定劝学所章程》，见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2册，第131-135页。

活机智与原则立场巧妙结合的独特风格。上海还将部章关于在各学区设立劝学员的规定，改为在各学区设立学董，在各联区成立劝学分所，设立正副劝学员。这样，上海的劝学所便形成了上有负责总董、视学协董、财政协董分工组合，中有各联区正副劝学员承上启下，下有学董以为呼应的独立的两级地方教育行政体系。比起部章规定来，其机构规模更为完整，分工更为细密，运行也更为有效。

清末学部除规定地方设立劝学所外，还公布了《教育会章程》，规定各省、府、州、县皆可设教育会，作为各级教育行政辅助机关，以“辅助教育行政，图教育之普及”。<sup>①</sup>这种“上下相维，官绅相通，借绅之力以辅官不足”的构想与设置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上海则更进一步，不仅早就设立了这两种机构，而且教育辅助机构的数量和种类都很可观，有学界中人为主体的沪学会、教育研究会，有学商联合协手的学商公会、群学会，还有专门性的如通俗教育社、私塾改良会等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清末上海还设立了上已提及的闾邑学务公会（后改为劝学公会），作为劝学所的议决选举机构，每年正月七日开大会，四月八日开议会。劝学所的总董、协董，各联区的正副劝学员，以及各区学董均由选举产生。劝学所的所有事宜，均经该机构议决。虽然学务公会或劝学公会后来被上海县教育会（由沪学会、教育研究会合并而成）所替代，但其议决选举职能依然存在。可以认为，清末上海实际上已经出现了教育行政机构、议决选举机构和教育辅助机构相互配套的萌芽，略具立法、行政分工的近代意味。它超出了清末部章的规定，体现了上海地区的先进性，也使上海的教育行政有可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民主监督与制约，并尽可能动员较为广泛的社会力量关心、支持和参与教育改革，为上海地区的近代化服务。

与清末上海地方教育行政体系的建立同样具有开创意义的是学区制的诞生。它是普及国民义务教育需要的产物。近代上海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对人口的文化知识修养提出了日益迫切的要求，教育普及尤其是国民义务教育的普及成为当务之急。学区的划分，使每个学区成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各学区兴学，（主要是小学）成绩如何。非常容易比较，管理者由此便于协调与指导，各学区则从比较中生发出竞争心理和荣誉需求，整个上海地区的国民义务教育可以在这种协调与竞争中获得充沛的活力，从而不停顿地向前发展。有鉴于此，上海教育界早在 1905 年 11 月举行的闾邑学务公会大会上，就对上海全境进行了学区划分，比有关部章提前了半年。学区的具体划分办法是：就各区、保、图前办团练时各区改设，得 22 个学区；再将城局管辖区域，分划北境为老闸区，南境为城厢区，共计 24 个学区。各学区均设有劝学员，负责本学区兴学事宜。同时各学区间又按一定数量与临近学区组成联区，设有正、副劝学员，负责本联区内的兴学事宜。学区制设立后，上海初等教育有了很大发展，各学区均建立了多少不等的初等小学、高等小学或两等小学，不少学区拥有 5-9 所小学，也有些学区拥有 10-13 所小学，大部分学区小学则在 2-4 所之间，<sup>②</sup>没有一个学区出现过零的办学记录，说明学区制对促进上海国民义务教育的普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这种划分学区管理地方学务的办法，为以后历届上海地方政府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所继承。尽管划分依据、具体划分数和辖境有所变动，但学区制基

<sup>①</sup> 《学部奏定各省教育会章程》，见陈学洵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598 页。

<sup>②</sup> 《宣统二年分上海学堂一览表》（庚戌十月止），第 2-3 页。

本精神不变。民国年间上海文盲率低于全国，与学区制的实行有很大的关系。而追根溯源，清末学区制创始之功实不可没。

### 三、教育机构的改革与多元化的教育结构

古代上海除元代曾有过社学（元代特有的农村小学）的设置外，主要的教育机构一般为县学、书院和私塾。其中县学系上海建县后由原建于南宋咸淳年间的上海镇学升格而来，属封建时代科举系列中的地方级教育机构。书院和私塾虽然名义上一般自外于科举系列，但其教学内容亦与官制所订相同，尤其是书院的官课，往往专课举业，和县学的考试简直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书院和私塾实际上成为科举制的附属物和预备场。这样，尽管这些教育机构（尤其是书院）对保存和传播中国古典文化、推动上海地区的文化发展发挥过一定的作用，书院的教学方法也有一定的可取性。但它们形成的唯举业是图、单纯培养封建治术人才的一元化的古典教育格局，只能适应中国古代官本位社会的需要。

开埠以后，上海社会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对人才种类需求也随之而异。它迫切要求建立一种多元化的教育结构，以培养多规格、多种类的人才群体。要实现这一目标不是那么轻而易举的。除了社会结构的内在需求，它还有待于教育行政机构的统一规划、新教育的办理经验，和大批新式师资。科举制度废除以前上海零星分散的新教育实践无法也未能自觉致力于此，继续改革教育机构，建立多元化的教育结构的任务，历史地落在清末上海教育改革者的肩上。

#### （一）书院的消失与私塾的改良——旧教育机构变迁之透视

至 19 世纪末，书院在上海的历史已将近七百多年。它对上海文化的贡献不容抹杀，但也确有其需要变革处。上海书院的变革，规模较大的要数同光年间，在同光新政的背景下进行。改革的结果是引进了部分西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使古老的书院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有趣的是，开埠以后设立的新式教育机构，不少也沿用书院的名义，而且越是外国人办的学校，以书院名义开办的越多，中国人开办的则反是。这种值得玩味的历史现象，反映了中外文化在上海地区的彼此接近和互相融合，也说明了书院在名义上生命力犹存。然而清末上海的教育改革，一是不提书院改制，二是新式教育机构不再采取书院其表、学校其里的方式，而堂堂正正地名之曰学堂。三是上海华人办的原有书院统统被改称为学堂，书院从此开始成为上海的历史存在。这种局面的产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清廷的因素。清末新政本是庚子国变后统治者无可奈何的选择。由于惧怕洋人的压力以及国内进步势力可能的他改革祸及已经摇摇欲坠的统治宝座，刚刚亲手扼杀了戊戌维新的刽子手才得不被迫充当起被害者的遗嘱执行人，对中国社会实行有限变革。它在有些方面甚至比维新分子走得更远，固然有历史法则的作用，但也不乏其邀功、邀赏于洋人的无可奈何的心理。所以新政期间有关教育改革的上谕、诏书及奏定章程，均明令改书院为学堂，却只字不提书院改制。所谓的“废科举，兴学校”很容易变成废科举、废书院、兴学校。其次是上海地区性因素，这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清末上海正当作为近代工商业城市崛起之时，其对西方实学的渴求，远甚于对基本上是娱情养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美学欣赏。书院固然也可开设西学，但学校作为新教育机构，显然更适宜新的教学内容与方法。第

二、当时上海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普及而非提高，书院主要采取自学的方法、研究的方法，适宜培养高级人才。第三、上海的人文历史相对短暂，传统文化根基不深，这使它比较容易接受新的事物，但也易于走向对传统的否定。书院作为传统教学机构，便成为教育机构改革中的否定对象物。

与书院的消失恰成对比的是私塾的改良。清末上海的全国都出现了一股改良私塾热，而在此之前中国历史上，除王阳明外，几乎很少有人注意到儿童教育及其改良。其原因主要是中国历代只注重成才之士，对儿童不同于成人的生理心理特征及其相适应的教学方法不甚了解也不予重视。庚子国变后，民智的开启，教育尤其是国民义务教育的普及，日益成为国人的共识。新式小学堂限于财力与新式师资又不能迅速多设，对传统儿童教育机构——私塾的改良于是才几乎破天荒地形成热潮。

清末上海在改良私塾方面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对改良私塾的意义和地位有比较明确而辩证的认识。清末上海有识之士指出：改良私塾是广泛兴学之初、财力困窘之际普及教育的重要措施，它化钱少，见效快，还能化解一部分可能存在的消极因素（如旧塾师者流）。但他们坚决反对以改良私塾为借口，拖延甚至阻挠新式小学堂的设立，明确表示：改良私塾只是一种过渡措施、权宜之计，是新式学校机构的补充，决不能喧宾夺主。<sup>①</sup>这种清醒的认识，使清末上海的改良私塾在整个教育机构的改革中处于一种恰当而准确的位置，既改革了旧式私塾，促使它向新学堂演变，又避免了外地某些改良私塾的越位现象，保证了新式小学堂的健康成长。

2、设立专门机构，采取若干较为切实的措施。改良私塾有许多具体事情要做，单靠劝学所或一般教育辅助机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有一个专门机构全力办理。1905年上海私塾改良总会就是这样一个机构。它由董事、干事、义务赞成员组成，并设总理、学务、财务、书记、管理员（管理书籍杂物）各一名，负责改良私塾的组织宣传工作，主要是：（1）筹措经费。（2）改造旧塾师，包括设立师范传习所和阅书处、以家塾贴费吸引更多馆师加入私塾改良会等。（3）改革私塾教学内容，包括明定课程、赠送新教科书。（4）改革私塾教学方法。旧私塾之最为时人诟病者乃教学方法上只知机械背诵，故私塾改良会特重之，明确提倡以重讲解不重记诵为要点的新教授法。（5）宣传私塾改良的意义，以及提倡官绅合办或会馆、公馆、义庄办改良私塾等。<sup>②</sup>

3、社会各界鼎力襄助，尤其是被改革者的主动合作。由于私塾改良总会的有效工作、社会舆论的广泛宣传，和教育改革对改良私塾的客观需要，上海各界都很重视这一改革工程，不少人直接投身于兹。如留日学生、私塾改良会、商务印书馆、中国公学等都相继开办了各项各种师范传习所、速成师范补习科之类，讲授新式小学堂必须开设的各门课程，以及新式师资必须具备的专业修养，如教育学、教育史、教授法、管理法及心理学等，帮助旧塾师改变知识结构。被改造者方面，那些不见得从旧教育获得多大利益、但很可能是教育改革隐性牺牲者的旧

<sup>①</sup> 沈颐《论改良私塾》，见《教育杂志》1910年第1期，社说，第119-124页。

<sup>②</sup> 光绪卅一年《上海私塾改良会总章程》，见《直隶教育杂志》1905年第12、14期。《上海私塾改良会会友初次至各乡镇劝学纪略》，见《时报》1905年5月18日，第369号，学界纪闻。

塾师们，也纷纷进入主要是为他们设立的短期培训机构，以改造自身的行为参与了新旧教育接轨的重要一环——对私塾的改良。被改造者的主动合作（除旧塾师对改良私塾的热情外，还有已获功名者对新式学校和留学教育的兴趣）是清末上海教育改革很重大的一个特色，它既是上海地区趋时、尚变、务实的民风民俗和近代价值观念的反映，又是开埠以后近半个世纪上海新式教育累积的产物。它的意义是缓冲了旧文人的心理震荡，减少了改革的阻力，保证了新旧两种教育较为平稳的过渡。

## （二）新式学堂势如潮涌——新教育结构之剖析

清末上海教育改革中新式学堂的设立。具有不同凡响的规模与气势。短短十年间，上海以一县之地设立的新式学堂不下 353 所之众，<sup>①</sup>比开埠以后半个世纪中外侨系统和华人系统学校总数还要多 5.4 倍。更值得重视的是，这些学堂已经开始具备了比较明确的级别与类别分工，各级别与类别间还形成了错综复杂的比例关系，从而组成了上海历史上第一个初具规模的多元化的近代教育结构。

### 1、普通中小学堂

普通中小学堂相对于实业类、专门类学堂而言，它是实施普通文化知识教育的主要机构。由于它不像专门和实业教育那样具有强烈的实用性，对个人谋生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效用相对间接，因而社会经济非发展到一定程度，或者社会非强烈感受到普通文化知识教育的重要性，普通中小学堂便不可能获得重视。普通小学堂由于其教育阶段距成才年龄较远，更不容易受到重视。在注重成才之士的中国，此况犹甚。古代没有什么普通中小学堂，姑且不论。试看近代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里程：洋务时期的外语、军事、科技教育固然是以成人为主，戊戌时期的时务、实业、师范教育又何尝不以成人为主。虽然维新派也曾有过普及教育的良好计划，但并未实施，维新变法本身已短命夭亡。清政府若不是受到庚子国变的刺激，和朝野上下、国内国外相互交织的诸种压力，远不会痛下决心改革教育，将似乎不那么实用的普通教育列入学制，并提倡国民义务教育。

近代上海由于经济发达，各方面得风气之先，戊戌以前已建有一些普通学堂。庚子国变后，普通教育与开发民智、强盛国家的关系日益明显，普通教育尤其是普通小学教育比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牵动了更多的社会阶层。在地方教育行政机关、工商各界、转变中的士绅、返沪留日学生、接受速成新知识培训的塾师和上海早期新式学堂毕业生的共同努力下，清末上海的普通中小学堂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笔者统计，建于这一时期的普通中小学堂约有 241 所，普通中学堂约 8 所，远远超过了部章关于兴学初期初等小学堂至少大县设 3 所、小县设 2 所、大镇设 1 所，中学如能州县皆设 1 所最善的规定。<sup>②</sup>

<sup>①</sup> 综合下列资料：《（民国）上海县续志》卷 9 学校上，卷 10 学校中，卷 11 学校下。《宣统二年分上海学堂一览表》（庚戌十月止）。《东方杂志》教育，各省教育汇志，第 1 年第 1 期、第 11 期，第 2 年第 3 期、第 11 期；第 3 年第 3 期、第 7 期、第 11 期，第 4 年第 2 期、第 3 期，第 5 年第 3 期、第 6 期。《上海大中小学校调查录》。《上海的学艺团体》，见《上海市通志馆期刊》。李纯康《上海学校溯源》，见《上海研究资料续集》，上海书店 1984 年版。《寰球中国学生报》，1906 年第 1 期。汤志均主编《近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9 年版。姚明辉《上海早期的新式学堂》，见《上海地方史资料》（四），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年版。

<sup>②</sup> 《奏定初等小学堂章程》，见朱有瓚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2 辑上册，第 175 页；《奏定中学堂章程》，同上，第 382 页。



清末上海普通小学堂除数量特多外，学年的课程设置也有特色。例如一些初等小学堂的学年定为4年，比部颁章程缩短1年。<sup>①</sup>课程方面除重视一般基础文化知识外，还适当讲授一些应用知识。这些改革适应了一般学生家庭的经济负担能力，和多数小学生直接进入社会谋生的需要，对提高国民义务教育在上海的普及程度和保证新旧教育的平稳过渡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与普通小学堂相比，清末上海的普通中学堂绝对数量虽不少，在普通教育结构中所占比例却较低，为3.21%。这是因为清末上海经济上已处于全国中心地位，对一般文化知识的渴求比它地为甚，因而普通中学堂的设立绝对数亦居领先地位。但就上海本身而言，个人谋求职业和社会发展实业的需求毕竟胜过对一般文化知识的追求，比起同等实业学堂和师范学堂来，普通中学堂在掌握专门求职技能方面终究稍逊一筹。因而人们往往要么小学毕业立即中止学业，要么宁肯去中等实业和师范学堂，影响了普通中学堂的生源。经济发展水平制约教育发展程度，对此，实在是只能适应而无法人为超越。

## 2、高等学堂

这里所谓高等学堂，并不具备现代汉语中“高等学府”一词那样涵盖全部高等教育机构的意味。在清末，它只是高等教育的初级阶段。清末学制将整个高等教育分为3个阶段，其由低到高的组成次序为：高等学堂——大学堂——通儒院。其中，高等学堂招收普通中学堂毕业生或具同等学力者，大学堂招收高等学堂和大学预备科毕业生或具同等学力者，通儒院则招收大学堂毕业生或具同等学力者。关于高等教育各级机构的设置地点也有硬性规定，如规定高等学堂在各省城设立1所；大学堂先在京师设立1所，然后择繁盛重要省份增设，并渐推及于各省；通儒院不单独设立，置于京师大学堂内。<sup>②</sup>清末学制的这些条文，体现了循序渐进的科学精神，也照顾到各地发展的不平衡性，但同时也反映了统治者试图以行政权力维护京师作为全国文化中心，省城作为地方文化中心的愚昧心态，在本质上与历代封建王朝将最高教育机构设在中央所在地，最多有时下放到州、京县或都督府治所的做法没有什么根本的区别。

但文化中心和经济中心一样，不是行政权力完全干预得了的。在近代社会，各地区间政治与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更是明显，政治与经济文化中心分离的现象也日益普遍。近代上海虽非行省治所，但它既然已经在经济文化的一般发展方面独步全国，在高等教育机构的设置方面必然也会冲破重重的清规戒律。

于是清末10年间，上海以区区一县之力，设立了2所高等学堂、3所高等实业学堂和3个高等教育程度的培训机构，它们是：复旦公学，1905年创设；中国公学，1906年创设；兵工专门学堂，1905年就广方言馆改设，内分专门与普通两科，专门科系高等学校程度；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1903年就南洋公学改设；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附设商船学堂，1909年附设。南洋公学特班、政治班和附设于该院译书院的东文学堂，均设于1901年。这些学堂在绝对数上似乎并不惊人，但作为非省城地方的高等教育机构，它们的设立，显示了上海地区的经济与

<sup>①</sup> 光绪卅四年《龙门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简章》，见该校杂志第1期；光绪卅二年《私立浦东中学校暂定章程》，见《江苏教育总会文牍》（二）下，第70页。

<sup>②</sup> 《奏定高等学堂章程》，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第570页；《奏定大学堂章程》，同上，第770-771页。

文化实力，在京师或省城垄断高等教育的封建格局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因而具有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重大社会意义。在实际办理时，上海的这些学堂有些还超过了高等学堂的级别限制，达到或部分达到了上一级高教机构的水平。其间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不仅有利于这一时期高等人才的培养，也为民国时期上海成为全国高等教育中心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如果将清末上海新设高等学堂数与初等、中等学堂数联系起来考察，可以发现初、中、高三级之间存在明显的数量递减状态：初等学堂（包括普通小学堂、初等实业学堂、女子小学堂和幼稚园）数量最多，共 285 所，占这一时期新设学堂总数的 80.73%；中等学堂（包括普通中学、中等师范、实业中学、专门中学和女子中学）数量次之，凡 63 所，占 17.84%；高等学堂数量最少，为 5 所，占总数 1.41%。这种饶有趣味的数量关系，一方面为相应高一层次的教育机构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基础和广泛的选择余地，有利于高一级人才的培养深造，在教育上具有明显的合理性、科学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上海高等教育尚处在起步阶段，一时还难以设立更多的高等学堂。这种状况的改变，当然有赖于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民国时期，随着上海地区近代化水平的相应提高，上海的高等教育终于在保持清末初中高三级教育机构数量递减关系的总体态势下，相应地提高了自身所占的比例，在教育的级别结构方面完成了对清末教育改革成果的继承与发展。

### 3、师范学堂

如果说近代教育的若干机构在古代多少可以寻得些面目与神情都很不相似的远祖的话，师范学堂可算是一个全新的范畴。古代社会是无所谓师范学堂的。因为古代教育尚未在文化范畴中获得一席独立之地，故而几乎但凡文人皆可为师，教师无须经过特殊训练，自然也就没有师范学堂这种专门的师资培训机构。古代教育对教学方法的不自觉状态于此关系极大。近代大工业和科技革命兴起后，近代生理学和心理学应运而生，教育学开始获得理论和实验两方面的依据。人们开始懂得：教育是一门技术也是一门艺术，有自己独特的现象和规律，向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提供专门的特殊训练是十分必要的。提供这种训练的教育机构——师范学堂就这样诞生了。因此，师范学堂不只具有如今人所熟知的一般意义上的“教育的工作母机”作用，它本身还是区别新旧教育的重大标志。

上海最早的师范学堂要数南洋公学的师范院，设于 1897 年。这也是中国最早的师范教育机构。其开创之功自不可没。但它并没有对当时的上海教育产生什么群体效应。原因是当时新教育机构为数尚少，对新师资所需并不很急切。清末上海教育改革兴起后，新教育几呈普遍推广、全面开花之势，有无数量众多的新式师资成为改革成败的首要关键，师范学堂的设立于是在上海形成热潮。

清末上海师范学堂的设立，大致有如下 3 个特点：

第一、速成师范教育机构与正规师范学堂相结合，以速成为主。清末上海教育改革全面推开后，对新师资所需数量既众，时间苦短。单靠年限较长的正规师范学堂实在有点远水解不了近火，因而迫切需要应急性的速成师范教育机构以为过渡。这种机构或名师范传习所，或称师范讲习所、师范补习科等，学制 4 个月至 1 年不等，本身师资以留日学生居多，招收对象则以旧塾师资为主，兼及旧学已有根底、愿投身新教育者。这样的机构清末上海至少出现过 11 所

(同期设立的正规师范学堂仅 6 所), 它们招收培训了不少师范生, 有的一个机构就招了千数百名学生, ①对适应上海新教育所需发挥了必不可少的应急作用, 甚至对民国年间的上海教育亦不无补充(民国初年上海一些教育机构尤其是小学校中仍有一部分这样的师范生执教)。

第二、独立师范学堂与附设师范科相结合。附设师范科一般附设在普通中学堂和女学堂内, 称速成或简易师范科。它们与师范传习所等同属速成师范教育机构, 区别在于附设师范科是附设在一定教育机构内, 而师范传习所等一般是独立设置的。附设师范科的这种特点使它与所附学堂关系密切, 便于师范生直接试教, 巩固师范学习成果, 提高师范教育质量, 从而有利于整个教育质量的提高。清末上海的附设师范科至少有 6 个。从此, 作为上海近代教育特色之一, 附设师范科不仅长期存在, 而且在数量上超过了独立师范学堂。民国期间, 上海的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等数量在全国往往名列前茅, 中等师范学堂数却常常几乎名落孙山, 其间秘密就在于此。这不但不是上海师范教育落后的证明, 反而是上海师范教育独特性、先进性的一种表现。

第三、设立女子师范学堂。清末上海男女社交风气尚未大开, 女子教育还处于单独设立女子学堂的初级阶段。为适应这种独特历史阶段的需要, 清末上海出现了一批女子师范学堂, 包括普通女子师范、女子体育师范、女子艺术师范和幼儿师范等共 5 所, 超过了部章关于女子师范学堂类别以普通中等师范为限, 数量上“每州县必设一所”, “初办时可暂由省城及府城官设一所”的规定, ②为各级各类女子学堂输送了相应所需的师资, 促进了女子教育比较全面的发展。

#### 4、女子学堂

前已提及, 女子学堂是女子教育的初级阶段。的确, 从科学的角度看, 依照性别设立学堂, 将两性在教育机构隔绝的做法, 并不符合男女学生身心正常成长的规律。但比起女子被剥夺受教育权, 其弊显然要小得多。尤其是在封建专制统治年代特别久长、程度特别酷烈、妇女地位特别低下的中国, 女子学堂的设立更是具有特别强烈的反抗封建压迫的时代意义。它标志着中国的女子第一次有可能步出闺门, 有限度地走向社会, 动摇了千百年来特别束缚妇女的封建伦理纲常, 开启了女子解放的第一道闸门。随着女子学堂的开办, 部分妇女文化程度和社会地位的提高, 必然会改变对妇女的歧视和两性社会关系的非常状态, 破除男女社交的封建禁忌, 整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将会由此大大提高, 女子教育本身也将由单独设立女子学堂, 进而向男女同学的更高阶段发展。

近代上海得风气之先, 女子学堂起步较早。开埠后半世纪中, 外侨系统女校已有 11 所, 华人也曾创办过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人自办女校。③清末教育改革全面推开后, 上海女学之风更盛。仅 1902 年至 1907 年的 6 年间, 上海设立的女学堂就有 22 所, 占清末上海新设女学堂总数的 62.85%。而在颁布于 1903 年的癸卯学制中, 女子教育尚被包容在家庭教育的范围内, 没有获得独立的地位。至 1907 年, 学部才姗姗来迟的颁布了《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 对于女子教育给予有限的承认。清末上海大多数女子学堂的设立比部颁

① 姚明辉《上海早期的新式学堂》, 见《上海地方史资料》(四), 第 41 页。

② 《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 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2 辑下册, 第 667 页。

③ 光绪廿三年《上海新设中国女学堂章程》, 见《时务报》第 47 册, 光绪廿三年十一月十一日, 第 7-10 页。

章程超前了 1 至 5 年。

在种类和程度方面，清末上海的女子学堂也很有特色。这一时期设立的女学堂有普通和特殊两类，属普通类的有女子普通中学堂、女子普通小学堂，凡 28 所；属特殊类的有女子师范学堂、女子实业中学堂和女子专门学堂 3 类，约 8 所。其间又可再分。女子师范学堂的分类见本章师范学堂部分，此不赘述。女子实业学堂则可分为蚕桑类、工艺类，女子专门学堂可分为医学类、体操类。程度方面，这一时期设立的上海女学堂，虽以初等阶段居多，占三分之二，中等阶段的女子学堂数也颇为可观，占了三分之一。而清末部章实际上将女子教育限制在小学教育和家庭教育的狭小范围内。比较起来，上海女子教育的天地显然要广阔得多。特别是女子师范类、女子实业类和女子专门类学堂的设立，便于女子掌握一技之长，对于她们走向社会，由经济独立继而争取人格独立、逐步实现男女平等的近代社会目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上海近代妇女解放和社会进步事业走在全国前列，女子教育发挥了重大的催化作用。

## 7、幼稚园（蒙养院）

幼稚园（蒙养院）是清末引进学前社会教育时对这种机构所给予的称呼。在此之前，中国的学前教育一般都在家庭内进行，且尚未从整个儿童教育中分化出来。鸦片战争以后，某些通商口岸虽然出现过个别外侨办的幼稚园，但社会影响不大。至《癸卯学制》，蒙养院才被列为初等教育阶段的第一个级次，与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依次衔接，高等小学堂又与中等学堂、高等学堂、大学堂及通儒院相接。癸卯学制的规定，使蒙养院开始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在中国学前社会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学前社会教育毕竟是在缺乏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匆促引进清末学制的。学制的制定者们并未真正懂得幼儿的生理学和心理学知识，以及学前幼儿智力开发对人的一生的重要作用，不过是因为“各国皆有幼稚园”，中国不设有失大清国体面而已。<sup>①</sup> 但为了维护封建伦理纲常，他们又不愿广设女学以解决学前教育师资。于是，便设计了一个自认为两全其美的办法：利用中国固有的育婴堂、敬节堂开办蒙养院，场地设在两堂内，师资亦由两堂原有乳媪、保姆稍事培训，初通文墨后充任。<sup>②</sup> 按育婴堂的主要目的是救济、养育孤苦无依的儿童，“教员”是未受过专门教育的节妇。敬节堂本是收养守节寡妇之所。寡妇、节妇本身无辜，她们是封建吃人礼教无价值的牺牲品。但她们大都文化程度低下，伦理观念陈旧，由她们组成或担任教员的机构很难不散发出陈腐的封建气息。按清末部章是绝对办不出什么近代学前社会教育机构的。

上海并没有也不可能照此办理。由于女学之风较盛，和近代西方儿童生理学、心理学知识较为广泛的传播，清末上海的蒙养院具有较鲜明的近代色彩。前已述及，清末上海新设的女子学堂约有 36 所，其中有一般的普通女学堂，也有女子师范学堂直至专门的幼师培训机构。幼师培训机构不多，但特别注重学前教育理论和技能技巧的学习与训练，是清末上海学前教育师资中的生力军。其它女子师范学堂和一般普通女学堂也设有一些儿童心理学、教育学课程，并常去蒙养院实习，这些学堂数量较多，是清末上海学前教育师资的主要来源。两部分师资间在专业程度上存有差异，但要而言之，比起那些乳媪、节妇来，总是具备了较多较高的近代文化

<sup>①</sup> 《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2 辑下册，第 746-747 页。

<sup>②</sup> 《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2 辑下册，第 746-747 页。

修养、专业知识技能和伦理价值观念，也更有利于将幼儿培养成近代社会所需要的人。

清末上海设立的蒙养院约有 12 所，它们大多附设在女子学堂中，约 6 所；少量的附设在男子普通小学堂内，约 2 所，也有不少独立设置的，有 4 所。在入院年龄方面，普遍比部章规定的要晚，更接近于学龄，如上海公历幼稚舍为 5-8 岁，爱国女学附设蒙养院和上海孤儿院附设幼稚园为 6-8 岁。<sup>①</sup>部章规定为 3-7 岁。课程方面，除部章规定的游戏、歌谣、谈话、手技外，有些还增设了识字、习算、图画等科，但这些课程在每日总课时数中不超过 37.5%，<sup>②</sup>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清末上海蒙养院的设立地点，有助于从空间上远离育婴堂、敬节堂之类旧事物而接近新式学堂。入院年龄接近学龄，则幼儿自立能力较强，教师“养”的任务减轻，而“教”的精力增多，更便于实施学前教育。课程方面适当增添教育性科目，但仍以游戏科目为主，则符合学前儿童的身心负荷度，也有利于与初等教育阶段的衔接与过渡。这些特点与前述师资特点综合在一起，不仅赋予清末上海的蒙养院以更多的近代色彩，而且使之更富于学前教育机构而不是社会福利机构的意味，为民国以后上海的学前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 6、实业学堂

和师范学堂一样，实业学堂也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和近代教育的标志。古代社会由于社会生产力相对低下，生产活动基本上采取简单劳动方式，生产技术变化较小，劳动者之间传授生产经验主要靠师傅带徒弟或口耳相传的方式，无须专门机构的培训。中国古代“学而优则仕”的单一教育结构和劳心劳力之间严格的畛域之见，更是从教育制度和价值观念两方面阻遏了生产技术培训机构的诞生。

近代大工业和科技革命的兴起，极大的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生产力几乎以魔术般的速度发展，直接刺激了科学形态的生产技术培训机构的问世。上海的经济发展虽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比起封建古典经济毕竟有了本质的不同，且在全国汪洋大海般的小农经济陪衬下，显得格外的引人注目。上海商品经济的如此发展，为上海实业学堂提供了比其它地区更为强烈的经济动因，促使它获得了独特的生命，主要表现在：

第一、农、工、商、商船、实业各类齐全，以工商类为主。清末十年间，上海设立的实业学堂总数约有 26 所，其类别分布是：农业类 2 所，工业类 5 所，商业（含英文）类 16 所，商船类 1 所，综合实业类 2 所。这些类别，囊括了清末部章对实业学堂的全部分类，而又以工商英文类居多，充分反映了上海作为近代工商业城市对实业学堂的需求重点，和国际性都市的风貌。

第二、初等、中等、高等互相衔接，依次递减。从纵向序列上看，这一时期设立的实业学堂可分为初、中、高三级，其中初等 18 所，中等 5 所，高等 3 所。与同时期上海整个初、中、高教育机构的级类结构和数量分布相似，也体现了循序渐进的科学精神，同时反映了当时上海地区对初级实业人员的急需。

第三、正规与补习相结合。在办学形式上，此期的实业学堂采取了正规与补习相结合的办

<sup>①</sup> 《上海公立幼稚舍章程》，见《江苏教育总会文牍》（二）下，第 85 页。《东方杂志》第 4 年第 3 期，教育，各省教育汇志，第 58 页。《上海孤儿院报告》（自戊申七月迄庚戌十二月止），《院事纪略》，第 6 页。

<sup>②</sup> 《上海公立幼稚舍章程》，同上。

法。其中属正规性质的共 18 所，属补习性质的有 12 所。补习实业学堂一般在晚上上课，每次 1-4 小时不等，以 2 小时居多。补习实业学堂的设置，对在业人员提供了一面就业、一面学习的机会，而且所学即所用，因而颇受欢迎。

第四、在清末各类学堂中发展最为充分。清末上海与实业学堂同属旁系的教育机构还有师范学堂与专门学堂。虽然它们也都采取了正规与速成的教学方式，但在级别设置上不甚完整，都缺了高等阶段，唯有实业学堂发展最为充分，在级别、门类、形式各方面都比较齐备，达到了自成体系的程度。这种状况，充分体现了上海社会各界对实业教育的关注，透露出注重实际的作风，并开启了民国年间上海职业教育的先河。

## 7、专门学堂

从严格的形式逻辑角度着眼，专门学堂应是与普通学堂对应而言，实业学堂应包容在专门学堂的外延内。但实际使用时，情形要复杂得多。清末学制有实业学堂之名，而无专门学堂之目。民初学制则在中、初等教育阶段设实业学校，在高等教育阶段设专门学校，门类除包容实业学校 4 类外，另加法政、医学、药学、美术、音乐、外国语等非生产性门类。<sup>①</sup>是则民初学制中专门学堂与实业学堂两概念间既是包容关系，又是并列关系。这种情形的产生，自有其历史原因，这里不想去正名。为研究方便，并考虑到清末上海教育的实际情况，本文姑且将两概念并列使用。

专门学堂作为一个种类的出现，也是近代教育的标志和近代社会的产物。古代社会由于受发展水平的制约，文化的整合性处于初级状态，学科分工不明显，对各种专门人才及其培养机构所需不多。在政治化一体程度特别高的古代中国，更是如此。虽然古代中国也曾有过律学、算学、医学等专门教育机构，但在整个教育结构中属于旁系，且多属畴人专家之学，不入正途。占主导统治地位的是从中央（太学、国子学、国子监）到地方（府厅州县学）所组成的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以入仕做官为教育宗旨的科举系列。

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列强破中国大门而入，在客观上不仅带来了近代生产方式，也输入了一些近代科学文化技术乃至社会管理制度。那种单纯培养封建治术人才的传统格局无法再维持下去，适应世界潮流、变革中国社会的迫切需要，刺激了近代专门学堂的孕育与诞生。洋务时期建立的一批方言、电报、医学等学堂是对这种刺激的最初反映。但比起军工技术之类，医学等专门学堂的发展毕竟微乎其微。维新时期，改革国家政治体制吸引了维新派的首要关注，专门学堂的建立再次受到冷落。新政期间，刚刚建立不久的学部作为第一个中央教育行政机构，某些方面依然受到中央级老资格各部门的掣肘，专门学堂与这些部门间关系较为直接，因而其设立往往以民政部、度支部、资政院乃至税务大臣等奏拟章程的名义出现，在壬寅学制中反而没有它的地位。

近代上海最早设立的具有专门学堂性质的教育机构要数广方言馆，继之而起的有东文学社等。他们大都以学习外语为主，反映了洋务运动时期对外语、翻译和外交人才的急需，以及戊戌维新时期大量译介西学的需要。庚子国变后，中国和上海的情况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预备

---

<sup>①</sup> 《教育部公布专门学校令》，见《教育杂志》第 4 卷第 10 号，1913 年 1 月。

立宪和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随着学习西方、改造中国观念的加强，和教育改革大规模的进行，对各种西学专门人才的需求量迅速上升，促进了专门学堂数量的增加和门类的改变。这一时期新设立的专门学堂约有 26 所，其中政法学堂 2 所，警察学堂 3 所，医学堂 4 所（不含女校）、体操学堂 4 所（不含女校），音乐学堂 1 所，戏剧学堂 1 所，外语、数理化、图画等专科学堂 11 所。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上海对专门人才的急需和专门学堂本身师资的缺乏，以上这些专门学堂有三分之二以上是速成性质，程度亦以中等居多。然而它们是上海历史上第一批形成种类群体的专门学堂，传授的是近代法律、医学、体育、艺术知识和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它们和实业学堂分别组成了促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变革的直接参与因素，对以培养封建治术人才为唯一目的的单一的传统教育格局造成了结构性的冲击与破坏，在教育与社会近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

## 8、其它教育机构

清末上海还建立了一些其它类型的新教育机构，主要有简易识字学塾和半日学堂、孤儿院和贫儿院，以及函授学校等。

### （1）简易识字学塾和半日学堂

与上述各级各类教育机构色设立有所不同，清末上海的简易识字学塾和半日学堂为数不多，据目前看到的资料仅 7 所。实际数字可能不止于此。但最多不太可能超过实业类补习学堂，当然更不可能超过普通小学堂。这种现象，可以从这些学堂的性质和发展状况的比较中寻求解释。

简易识字学塾和半日学堂都是初等小学的辅助机关。其招生对象以年长失学及贫寒子弟无力就学者为主，上课时间一般每天 2—3 小时，以期不妨碍就业谋生。其识字扫盲的功用是无可怀疑的，免收学费亦可争取一部分贫寒学生。但其课程设置简单，学习年限较短，不如普通小学堂正规；所教则限于识字扫盲，不如实业类补习学堂识字与学习实业技能并举来得实用。而且清末上海小学堂的入学年限比部章更宽，有的放宽到 12—16 岁，<sup>①</sup>实际还有超过此限的。这样，年长失学、家境尚容支付学费者易流向初等小学堂；家境实在贫寒、亟谋生计者则易流向实业类补习学堂，简易识字学塾和半日学堂的生源自然要受到影响。这当然不说明清末上海人对识字扫盲不重视，恰恰相反，它反映出当时上海国民义务教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 （2）孤儿院和贫儿院

这是清末上海人的创举，学制中并无此类学堂的规定。其为数也不多，仅 2 所，即：上海孤儿院和上海贫儿院。但意义却不小。它不像育婴堂养而不教，也不像私塾教（四书五经）而不养，与新式学堂的只教（近代文化知识）不养也不相同。它兼教养于一身，一方面传授近代文化基础知识，另一方面培养若干谋生技能，以期既有一般文化素养，又能独立谋生；既使个人摆脱贫困，又使社会增加生产。<sup>②</sup>这种半工半读制度的实行，对入院贫儿孤儿的智力开发和经济独立很有助益，对打破脑体贵贱的封建观念也有很大作用，在封建传统悠久深厚的中国，值得特别注意。

<sup>①</sup> 光绪卅四年《龙门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简章》，见该校杂志第 1 期；光绪卅二年《私立浦东中学校暂定章程》，见《江苏教育总会文牍》（二）下；光绪廿七年《上海澄衷蒙学堂章程》。

<sup>②</sup> 《上海孤儿院报告》（庚戌冬季重订），见《上海孤儿院报告》（自戊申七月迄庚戌十二月止），第 85-87 页；《章程汇》，见《上海贫儿院第一次报告》（自开办至宣统元年六月止），第 50-63 页。

### (3) 函授学校

这也是学制所没有的教育机构，主要有 2 所，即 1908 年世界语学会所创设的世界语函授学校，和宣统年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师范讲习社。此外，中国教育会也曾经模仿通信函授法，发行丛刊。<sup>①</sup>这些学校或团体所采用的函授方式比面授更为灵活，对通讯设施和求学者的文化程度、自学能力都具有更高的要求。因而虽然数量不多，却着实具有一种划时代的意义，标志着清末上海的教育和社会近代化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

## 9、留学教育

留学教育是留居国外进行学习的一种方式。严格说来，它主要指在国外本科高等学校学习，在研究生院学习、研究或进修。但中国是被迫进入近代社会的。近代中国的许多事情往往呈现出非常态，因而很难以常态的或是学院派的眼光对待。近代中国的留学教育也是如此。尤其是清末时期，由于清政府留学政策有意向日本倾斜，客观上留学日本具有地近费省、文字相近易学、文化习惯相近易于适应等便利条件，科举甫停、新学始兴的中国又缺乏新教育的坚实基础，清末中国便形成了留学国别以日本为主、留学科别以相对易学的法政、军事、师范等类为主的留学格局。而且由于革命党人在日本的活动和国内腐败政局的刺激，不少留日学生将主要精力用于寻求革命理论和方法，乃至直接投身革命，更使清末留日运动超出了纯粹留学教育的范畴，成为特定历史时间所特有的历史现象。

清末上海的情况与此不同。在此之前，上海新教育已有近半个世纪的积累。清末之际，又建立了大批仿型西方的新式学堂，外侨系统的学校也相应提高程度，有些径以直入国外大学相号召。上海新教育的这些成就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就地解决了社会各界对一般新学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也为留学教育造就了相对较高的起点，其集中表现为留学人员的原有学历构成较高，笔者曾经考证过清末上海 249 名留学人员，发现其中新式学堂毕业生约 180 名，占 72.29%；在这 180 人中，大学本科毕业生有 157 名，占 63.05%。<sup>②</sup>这种高学历的构成，很自然地将上海的留学人员，引向近代化程度较高的欧美地区和学习难度较大的科目。所以清末上海留学日本、速成程度较少，仅占 24.56%；留学欧美、接受正规高等教育的较多，占 75.44%，其中不少人获硕士、博士学位。学科方面，留学工、商、农、实业类者最多，占 55.67%；留学医学、地质学、哲学、物理学等专门类者约占 16.49%，这两类学科都需要较为坚实的知识基础，学习难度较大。而当时中国留日学生的主要学科投向、学习难度相对较低的师范、法政、军事

<sup>①</sup> 《近代上海大事记》第 560 页。

<sup>②</sup> 综合下列资料：佚名编《清末各省官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辑》第 50 辑，（台）文海出版社，第 29、65、108、110-111、117、134、140、161、227、266、271、278、280、293、296、378、389 页。房兆楹辑《清末民初洋学学生题名录初辑》，宜霖室丛编，（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2 年 4 月影印版。南洋公学《1897—1906 年留学生名单》，见《交通大学校史资料汇编》第一卷，第 75-77 页；上海高等实业学堂《1907—1920 年出国留学学生名单》，同上，第 256-257 页。复旦公学《1908—1911 年高等正科毕业学生名单》，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2 辑下册，第 711-713 页。《南洋中学卅周年纪念文》。《（民国）上海县续志》卷 10 学校中，第 9、19 页；卷 15 人物上，第 15、30、32 页；卷 16 选举表。黄炎培《浦东中学校大事记》，见《浦东中学校杂志》第一期。光绪卅一年《澄衷学堂董事上苏抚禀》，见《直隶教育杂志》第 1 年第 11 期，第 29-30 页。《东方杂志》第 2 年第 6 期，教育，第 163 页；《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附属高等小学堂十周年纪念册》，1911 年版，上海文明书局。《复旦同学会刊》八卷二期，1939 年 8 月号。李盛平主编《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9 年，第 53、66、131、134、178、197、219、262、302、332、421、454、501、504、590、746 页。



类，在清末上海的留学科目中只占 27.83%。<sup>①</sup>原有学历构成、留学国别和学科的如上分布，使清末上海的留学具备了更纯粹的留学教育意味。

需要注意的是，清末上海留学生中，日后成为专家学者的较多，职业革命家较少。这种状况的产生，除上海留学教育的纯粹性以外，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刻意爱护关系甚大。胡适曾在《四十自述》中谈到：在中国公学学习期间，一些革命党人虽然对他并不隐瞒其身份与活动，却并不动员他加入同盟会。20 年以后他才知道，当时公学里的同盟会员曾经商量讨论过他的情况，认为他将来可以做学问，而革命是很危险的事，所以没让他直接参加革命活动。<sup>②</sup>这段感人的记述，反映了革命党人的博大胸怀。虽然不是直接谈论留学，但其中所折射的关心爱护专家学者、为革命保留建设人才的基本精神，于留学是一样适用的。清末上海留学生中保留较多的专家学者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有关的说法并不是毫无根据的臆测。

当然，清末上海的留学生并不是完全被动地接受保护。除极少数亲日卖国者外，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同样具有爱国爱民、救亡图存的热血忠肠。只是由于客观因素的制约，一般采取比较间接的知识技术服务型，较少那种牺牲生命意义上的直接献身型。应当说，在历史过程的演进中，这两种方式都有其存在的价值，并无高下之分。清末上海的留学生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推动了历史的前进。

#### 四、教育内容的改革与西主中辅的课程设置机构

以上探讨了教育机构的改革及其外部联系，着眼点在于对人才群体外部结构的影响。这里仅从教育内容改革的角度，研究一下清末上海教育改革对人才内在素质的制约。

比较起来，清末上海教育内容的改革比教育机构的改革远为复杂。这里不仅有西学中学的矛盾，而且具有古代近代的冲突，古今中外之间，又缠绕纠结，犬牙交错。它所形成的西主中辅、厚今薄古的课程设置结构，对上海一代中青年学生的知识结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并由此转而作用于清末民初的社会。

##### （一）对传统教学内容的变革与传统中学课程的失落

一定时期的教学内容是一定时期文化与社会状况在教学领域中的投影。古代中国的教学内容则是古代中国文化与社会的反映。在古代中国，空间领域辽阔而专制君权发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史悠久而社会演化速度相对迟缓，“鉴往可以知来”。因而中国史地知识素来被人重视，成为古代重要的教学内容。西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的教育政策以后，注重人伦等级身份关系的儒家被定于一尊，改变了先秦九流十家的平等的学术地位。儒家的主要著作也随之上升为至高无上的经书，演变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并被规定为中国古代主要的教学内容。作为上述教学内容的外在表现形式，经史、舆地、词章、典故于是成为古代中国教育机构的主要课程。几千年来，无论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还是若干朝代帝王对佛学、律学或绘画的特殊爱好，都没有改变这个根本的教学格局。古代上海也是如此。

<sup>①</sup> 同上注。

<sup>②</sup> 《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 2 辑上册，第 747 页。

近代中国社会发挥了很大的变化。在中外双方的交战中，天朝上国往往败于那些在历史资格和版图幅员上远不能和中国相比的国家，割地赔款不断，锦绣河山破碎。国势的衰微动摇了在很大程度上建筑于历史悠久、疆域辽阔基础上的古代爱国情愫，中国人对自己国家史地知识的热情开始消退，转而把目光投向那些击败了自己的国家，希望从那里寻觅振兴民族的救世良药。外国史地知识于是成为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传统的教学课程因而也发生了变化，外国史地知识开始进入中国的教学领域，在帮助国人开眼看世界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上海的步伐迈得更快更急。作为一个历史并不悠久、传统文化根基薄弱、崛起于近代的工商业城市，其愈益走向近代化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与古典形态的教育结构之间拉开了日甚一日的距离。个别传统课程的教学改革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它对近代学问和近代人才的渴求。经过开埠以后一段时期教学内容中体西用的相持阶段，清末上海教育界迅速走向了西主中辅、厚今薄古的教学格局。

最明显的表现莫过于对经学教学的变革。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干脆取消读经讲经课，这部分学校比较多，在部章规定应设此课、且目前已知课程门类的35所（个）小学堂（科）中，占65.71%。其中，各级各类学校又有所不同。高等小学不设率为55.55%，中等学校为77.77%，高等学校则高达100%。低、中、高各级学校不设率呈递增趋势。<sup>①</sup>部章未定经义课的学堂，当然无一设置此课。二是大量削减经学课时，削减率在77.77%—91.66%，所剩无几。也有的学堂同时采取晚设两年的方式，其课时削减幅度因而更大。<sup>②</sup>儒家经学在清末上海课程中的统治地位丧失殆尽。

但儒学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可以不被独尊，却不应该全盘丢弃。清末上海并没有走到这一步，它所做到的，是将儒学从至高无上的独尊地位，回复到一般文学的本来面目，因而在当时的国文和伦理课中，依然保存了一些传统儒学的内容。如吴若安回忆务本女塾中学科国文教材多选自《大学》、《论语》、《孟子》、《礼记》、《诗经》、《尔雅》等。<sup>③</sup>这部分学校为数当不会少。

不过，清末上海的国文和伦理课也不是儒学的一统天下，甚至并不是传统中学的一统天下。儒学在国文和伦理课上，不过是众多文字教材和伦理守则中的一部分，比起传播进化论的《天

<sup>①</sup> 综合下列资料：《南洋公学附小章程》，见《上海高等实业学堂附属高等小学堂十周年纪念册》，上海文明书局，1911年版。《上海孤儿院报告》（光绪廿四年七月至卅四年六月止）。《上海贫儿院第一次报告》（自开办至宣统元年六月止），1909年版，第15页。光绪卅四年《龙门师范学校附属小学简章》。光绪卅一年《私立南洋中学堂章程》，见《直隶教育杂志》第1年第18期。光绪卅二年《私立浦东中学校暂定章程》。光绪卅二年《商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第126-129页。宣统三年《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见《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第一卷），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第202-211页。光绪卅二年《拟设南洋公学特班章程》，同上，第64页。杨耀文《本校40年来之重要变迁》，见《交通大学40周年纪念刊》，第33页。1905年《复旦公学章程》，见《复旦大学志》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66-67页。《爱国学社之章程》，见《选报》第35期，教育，第24页。《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第83-84页。光绪卅一年《龙门师范学校暂定章程》，见《直隶教育杂志》1905年第15期，第41页。光绪卅一年《务本女学堂第2次改良规则》，光绪卅一年《务本女塾增设初等、高等女子小学规则设置大意》，均见《直隶教育杂志》第一年第17期，第48-49页。光绪卅年秋季《爱国女学校补订章程》，见《警钟时报》，1904年8月1日。《上海女子蚕业学校章程》，见《女子世界》第2年第6期，《东方杂志》第2年第11期，教育，各省教育汇志，第290—291页；第4年第3期，同上，第58页；第5年第6期，同上，第135-136页。《近代上海大事记》，第651页。

<sup>②</sup> 同上注。

<sup>③</sup> 吴若安《回忆上海务本女塾》，见《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下册，第604-605页。

演论》，和鼓吹天赋人权、男女平等、妇女解放的《各国女学源流》，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学说并不具备很强的竞争力。反差强烈的几种学问被置于一处，形成了一种极富戏剧性的对比。它和整个中主西辅、厚今薄古的教学格局一起，对于塑成集新思想与旧道德于一身的民初一代人物发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与作用。

变换一下角度可以发现：清末上海的伦理课的变革不仅表现在内容方面，它是继读经讲经之后大幅度削减课时的第二门课程。其课程削减率之高，大多在 50%左右。而削减课时的校（科）数比例，也高达 32.43%。这和国文、外语及其他西学课程超课时率、门类增设率居高不下的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并不在于这些课程各自的特性，而在于商品经济的冲击。在激烈的商品经济竞争中，决定胜负的往往是智力、体力与财力的结合，很少甚至并不取决于道德修养的力量。清末上海商品经济既然比其他地区相对发达，过分强调甚至崇拜道德修养的古代中国文化对它的影响既然不深，它在教学改革中走向对德育课程的轻视就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在清末上海学校中，遭受冷落程度仅次于读经讲经和伦理修身课程的历史与地理课。其中又以历史课为最：地理课削减课时的学堂占 12%，但增设课时的亦有 16%，历史课削减课时的学堂却有 20%，增设课时的只有 8%。如果以中国史地课和外国史地课相比，则以中国史地课减少最多，清末上海至少有 2 所学堂设有外国历史或地理课而不设中国史地课，同期不设外国地理的学堂却只有 1 所。这些特点的出现，除前述国势衰颓导致对中国史地知识的淡漠以外，史地知识功能的转换和学生出路的变化是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近代以还上海地区社会变化的速度超过了古代上海，也超过了同期其他许多地区，前所未闻的新的事物不断涌现。与此同时，近代西方社会理论在上海受到相当热烈的欢迎，述而不作的中国历史著作在鉴往知来方面遇到了强劲的挑战。史地知识在近代上海日益失却其宣扬王化政教的意义，开始还原为一般的文化素养。但对于科举制度废除之后，学而出为农工商的大多数普通学生而言，一般的史地修养当然比不上直接利于谋生的西方实学来得迫切。史地课尤其是中国史地课地位的下跌于是必不可免了。

## （二）、近代西学课程的成批设置与反客为主

前已提及，开埠以后上海教学内容曾有过一个中体西用的相持阶段。在那个阶段，上海的西学课程一般限于外语、算术和体操之类，声光化电等需要一定西学基础的课程主要设于一些外侨学校和个别中国官办学校，音乐、图画的美学陶冶作用尚未引起时人普遍的重视。受传统劳心劳力观念的影响，手工课基本被排斥在教育领域之外。这种教学格局，表明当时上海教育还处于新旧过渡的初期阶段。

清末，上海开始了更大规模的近代化建设运动，西学传播基地业已形成，新教育已有了半个世纪的初步实践，清末教育改革初期为解决新型师资又付出了种种努力。这些都使得这时的上海在西学师资、生源和学科建设方面具备了良好的基础，西学课程的设置于是向新的阶段演进。

清末上海西学课程的设置，远远改变了开埠以后零星散乱的局面，具有了一定程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其中，作为公共课开设的西学课程，有外语、数学（算术）、物理化学（格致）、

手工、音乐（唱歌）、体育（体操）和美术（图画）。作为专业课开设的西学课程则更丰富，如高等学堂第一类（政法科、文学科、商科大学之预备，相当于今日的文科大学）设有伦理学、论理学（名学、辩学）、心理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国家学、经济学、理财学、簿记学等。高等学堂第二类（理科、工科、农科大学之预备，相当于今日的理工科大学）设有地质学、矿物学、动物学、植物学、测量学等。高等实业学堂铁路科有测量、建筑、地质、电学、机器学、理财学、汽机学、桥梁学、水力学、热力学、法律、工程、天文学等。航海专科有航海术、重学、水力学、海事法规、商业地理、救急医术、海上气象学、平面测量、水面测量、航海天文学、理财学、商业学、商船运用术、商船法规、商法、船内卫生法、各国通语旗法、舢板运用术、缆绳运用术、造船学、机轮术、炮术学、泳水术、炮术实习、航海实习等。电机专科有地质学、化学、热力学、电学、电机学、机器学、汽机学、法律等。商业专科有商品学、制造学、商法学、簿记、商运学、银行学、理财学、财政学、商业统计学、国际公法、商业道德、商业实习等。中学蚕业专业有蚕体解剖、蚕体生理、显微镜、蚕病理、栽桑法、养蚕法、缫丝法、土壤学、肥料学、实习等。此外，还有外国语文类的英文、法文、德文、拉丁文、日文，音乐类的乐典、和声学，体育类的生理学、体育学、医学，师范类的教育学、心理学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西学课程的设立，有不少是上海地区的创造，并非照搬部章。尤其是公共课方面的西学课程，普遍地出现了超部颁增设门类和超课时的现象。如外语方面，一些属部章规定不设外语课的学堂中，有 13 所增设此课。其中，以高等小学堂增设率最高，占 88.88%；初等师范、女子师范次之，占 60%；艺徒学堂和初等小学堂也有增设外文课的。初等小学堂外语课始设年最早的是上海孤儿院，始于三年级。部章规定应设外语课的中等学堂，则有 60% 超过课时，超时率大多成倍。数理化方面，增设数学课、理化课的各有 2-3 所高等小学堂，数学课超课时的高等小学堂有 75%，中等学堂有 60%；理化课超课时的中等学堂为 40%，师范学堂为 80%，超时率一般在 50% 左右，也有高达 2-3 倍的。手工课增设情况是：初等小学堂 62.5%，高等小学堂 55.55%。音乐课增设最广，初等小学堂、高等小学堂、中学堂、师范学堂都有，增设率依次为 62.50%、88.88%、44.44%、83.33%。美术课增设率也比较高，初等小学堂为 62.5%、中等学堂为 22.22%、高等小学堂为 14.28%。专业西学课也有增设门类的现象，如复旦公学正斋第一部、中国公学、爱国学社高等级增设了心理学、簿记学、社会学、国家学、政治学。复旦公学正斋第二部增设了动物学、植物学、测量学。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商业专科和航海专科分别增设了商运学、银行学、泳水术、重学、水力学、平面测量、航海天文学、各国通语旗法、舢板运用术、帆缆运用术等。

清末上海西学课程的设置，不仅具有系统性和创造性，而且改变了开埠以后西学、中学课程门类之间的逆向数量对比关系，西学课程开始成为上海教学领域中的主角。试以中西课程门类比率为例。在清末上海已知课程门类的 38 所学堂中，有 37 所学堂的西学课程门类超过了中学课程门类。其中，西学中学课程门类比率小于 2 倍的有 19 所，占 50%；2 倍以上的有 18 所，占 43.76%。比率持平的只有 1 所。考虑到作为对比的传统中学课程均已注入西学素质，这个估计无疑是保守的。但也正因为如此，用它来说明西学课程已在清末上海教学领域中成为主角，才不会有夸大之嫌。

西学课程设置的系统性、创造性，西学成为教学领域的主角，和前述传统中学课程的相应失落：这一切，都是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文化现象。它们表明：拥有雄厚的西学实力而传统中学相对薄弱的上海地区，在教学内容的近代化方面也走在了全国前列。它所形成的西主中辅、厚今薄古的教学格局，突破了中体西用的藩篱，使清末上海的教育改革得以服务于真正走向近代化的社会变革，而免于成为末代专制王朝的装饰和点缀。与此同时，它对整整一代中青年学生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依学生的年龄和原有文化素养的不同而各有差异。对年龄较长、旧学已有根基的一小部分学生而言，清末上海的教学格局，无疑是提供了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绝妙好机会，使他们有幸或有可能成为中西文化共同孕育的学问大家。而对绝大多数完全成长于清末新式学堂、又缺乏旧式家学渊源的学生来说，则导致了中西知识的结构失衡，对西方文化的了解胜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认识。这种失衡的知识结构的出现，在重建中国文化尚未成为主要议题的清末时期，一般地说有着某种历史必然性和进步性，在总体上有益于救亡图存的社会主题。但它确实也很容易导致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旨在反对传统文化、以打倒孔家店为号召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所以以上海为策源地，民初的舆论宽松和上海出版条件的优越只是外部的因素，真正的机制存在于大批中西知识结构失衡、思想激进的学生群体之中。至于民国以后上海在教学内容继续近代化的同时，并没有对传统文化的重建予以应有的重视，那是值得另著专文探讨的问题。这里可以提及的是：清末上海教学内容的改革是其始作俑者。

## 五、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和教育机构管理方式的改革

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和教育机构管理方式的改革，是清末上海教育改革中的技术性操作层次，它的意义是为这场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提供方法上的保证，同时也对这场改革的实现程度和范围产生能动的反作用。

### 1、教学组织形式的改革

一定的教学组织形式是一定社会对教育需要程度的产物。古代社会发展水平低下，对人才的需求量不象近代社会那么庞大，个别传授的教学组织形式已足可应付。这在中外皆然。近代大工业革命兴起之后，对人才的需求量猛增，古代教育机构那种手工作坊式的小批量生产方式失去了继续存在的历史理由，教学组织形式的改革势在必行。这种改革首先是在近代化发源地的西方社会进行的，它的成果是创造了迄今依然富于生命力的两种教学组织形式——班级授课制和单班（级）复式授课制。其中，班级授课制是一种常态的组织形式，它的要点是将学生按年龄和程度编成班级，每个班级都有固定的学生和课程，由术业各有专攻的教师按照固定的教学进度面对全班学生进行教学。单班（级）复式授课制是班级授课制的变态形式，它的要点是将一定地区不同年龄和程度的学生合编在往往只有一个“学级”（今称班级）的学校（一般是小学）内，由一位教师在同一课堂、同一时间内，交替轮换地对不同的学生进行教学。这种方法有点类似中国古代的私塾，但教学内容、学校性质和管理方式都绝然不同。它主要适用于人口密度较低、居住分散、交通不便、师资生源比较贫乏、校舍和教学设备亦相应缺乏的地区，如海岛、山区和一些农村地区，特别适用于近代教育刚刚起步的阶段。近代德国、日本等都盛行

过这种形式。

班级授课制传入中国最早始于 1862 年的京师同文馆。上海开埠以后的新式学堂也大都按班级授课。但由于其时新教育尚在萌芽时期，学校的西学课程程度一般不高，因而往往一人兼教数课，专业分工并不严密。清末之际，随着上海教育改革的全面推开，数百所新式学堂一起涌现，班级授课制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普及，各级各类学校内部，都进行了不同的级别划分，如寻常级、高等级；预科、本科；也有以班指级，如头班、二班之类；还有称之为年级的，如南洋公学附小分为 4 个年级，那就更接近于今日流行的称呼了。各级别之间，有着一定的程度差异，须经过严格的考试，及格后方能升入高一级别。各级别内部，则按生源的多寡，分成若干班级，由不同的教师按课程安排传授各自专长的学科。和开埠以后的情形不同，教师之间不再笼统地划分为中文教习、西文教习，而是具体地依照学科分工，别为某科教习（员）。有的学堂年级班级较多，同一学科的教师更是不止 1、2 个。也有的学堂开始实行级任制，按年级配备相对稳定的师资力量。这些做法，更有利于教师潜心钻研任课年级的年龄特点和班级的群体特征，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其提高教学质量的作用在今天看来是十分浅显的。对清末之际的上海来说，却是积 50 余年历史经验之结果，是值得肯定的历史的进步。

比起班级授课制，单班（级）授课制进入中国要晚得多。它是清末之际从日本引进的，由于日语“学级”意指集团，相当于汉语的“班”，故时称单级授课制，其实称为单班授课制才符合汉语的习惯和这一教学组织形式的确切含义。不过这是后话了。在这里，我们只要知道它的来源，知道它也是清末教育受日本影响的一个实例就可以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清末上海在引进和传播单班（级）授课制中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根据上述单班（级）授课制的特性，其适宜于大规模教育改革刚刚兴起、民穷财乏的清末中国是不言而喻的。但真要实行又不是那么简单容易的。它需要有一定的一般新教育经验，同时经过这种组织形式的特殊训练。在清末中国，只有上海才堪当此重任。于是，江苏教育总会在派遣专人赴日学习单班（级）授课制的基础上，于上海相继举办了二届单级教授练习所，讲授从日本学习获得的成果，有理论，有实际，还安排了专门的实习学校。各地来学的不少，第二届就有皖、豫、闽、浙、赣、湘、桂七省共 19 名学员。<sup>①</sup>该练习所的主要教材、赴日人员编写的《单级教授法》被寄往全国各地教育会和练习所，<sup>②</sup>赴日人员专程往苏省各地演讲，<sup>③</sup>外地教育行政机构如直隶学务公所等也热心函询具体办法，恳请指点。<sup>④</sup>一时间，上海成为传播单班（级）授课制的中心，局面颇为壮观。影响所及，还至于清廷学部。宣统二年至三年，学部就单班（级）教授和二部教授两次奏本，原起于民间的单班（级）教授热由此获得了合法的地位，进一步推向全国。

上海本身当然也颇为重视单班（级）授课制。除派人参加上述单班（级）教授练习所外，

<sup>①</sup> 宣统二年《江苏教育总会咨呈江督张单级教授练习所举办第二届毕业文》，见《江苏教育总会文牍》（五）甲，第 15 页。

<sup>②</sup> 《宣统元年考察单级教授杨保恒、谕旨一、周维城回国后谈话会纪略》，见《江苏教育总会文牍》（四）丙，第 112 页。

<sup>③</sup> 俞子夷《单级、复式、二部教法》，见陈学洵主编《中国近代教育史教育参考资料》上册，第 677 页。

<sup>④</sup> 《直隶学务公所致江苏教育总会书》，见《江苏教育总会文牍》（五），甲，第 78-79 页。

一些师范学校如龙门师范等还办起了单级小学，以便师范生实习，培养更多的单班（级）教授师资。这些师范生毕业后，有的直接任教于若干单级小学，也有的是在一般多级学校工作，遇到一些年级学生太少时，往往也会参用单班（级）教授的基本精神，将学生合级（班）编制教授。单班（级）教授的实行，使当时有限的财力和师资得到了较为合理的使用，使教师增长了独立工作的才干，也培养了学生的自学能力和合作精神，在清末普及初等教育方面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 2、教学方法的改革

一定的教学方法与一定社会的文化背景和教学内容有关。中国封建社会专制君权高度发达，思想文化钳制紧密，教学内容主要是从属于人文领域的圣贤典籍。因而在教学方法上必然地形成了重视机械记忆与复述，和文字形态的学习为唯一方式的特征，以便培养以帝王意志为律令、以儒学教诲为信条的忠臣或顺民。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输入和西方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知识在中国的传播，改变了中国古典的教学内容，也动摇了与之相应的教学方法。一些新式教育机构开始引进西方方式。上海开埠以后的新式学堂也是如此。由于只重机械记诵的教学方法与专制君权之间在扼杀创造性思维方面具有逻辑上的内在联系，也由于改变这种教学方法并不需要太多的物质手段，新兴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强盛的上海，便首先把教学方法改革的锋芒对准了机械背诵。不少新式学堂异口同声地批评旧日的训蒙方法：“记诵为多，启悟者少。”<sup>①</sup>“旧法令学生苦认方块字，孤寂无情，断非善法。”<sup>②</sup>于是，他们或者自编新教科书，以联字组词成句的方式教授汉字；或者采取教师讲解于前、学生还解于后的办法，帮助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学习内容。也有个别外侨学校和中国官办学校基于一定的西学基础和财力，备置了若干简单的理化仪器和图表模型。

清末之际，上海的教学方法进一步发生变革。由于西学课程的提高和西方教育学说的广泛传播，这一时期教学方法改革的范围已经由比较单一的理解与记忆的关系，进而向更广阔的领域发展。

首先是德国赫尔巴特学派分段教授法的流行。这是一种关于课堂教学阶段的实施规则。其基本精神是：强调学生的心理活动和观念体系均有其自身的次序与规律，教师必须以此为依据，安排提示教材的次序，组成课堂教学的不同阶段，以帮助指导学生获得比较系统的知识，形成一定的观念体系。这种方法注意到教学过程的不同阶段和有机联系，努力使教学过程适应学生的心理活动过程，重视教学和知识的系统性。与无视儿童生理心理特征和教学系统性的中国传统教学方法有本质的不同。同时它又带有德国式的严谨与实际，极富操作性。因而在急于寻求与新教育相适应而又简便易行的新式教学方法的清末上海，赫尔巴特学派的分段教授法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各种教育学教科书对之争相介绍，如销量极大的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的各科教授法，基本上都采用三段式，将整个教学过程分解为预备或复习、教授新课和练习 3 个阶段。1909 年蒋维乔等编写的《各科教授法精义》，采用的是 5 段教授法。其他一些书局出版的师范学堂用书在述及教学方法时，选择的也大都是同属于赫尔巴特学派教学阶段理论的 3 段、4 段或 5

<sup>①</sup> 光绪廿三年《王氏育材书塾章程》，见《知新报》第 30 册，第 8 页，光绪廿三年八月十一日。

<sup>②</sup> 《南洋公学蒙学课本初编编辑大意》（1897 年），见《近代中国教育史料》第 2 册，第 244 页。

段教授法。经过这些努力和教师们的实践，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阶段理论，成为清末上海最为流行的西方教育理论，对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造成了很大的冲击。

除了上述课堂教学的根本方法之外，清末上海引进的其他辅助教学方法还有不少，比较重要的有：实验法、实习法、直观法和参观法。其中，实验法主要用于理化课程，实习法主要用于师范和实业类学堂，直观法主要用于史地类课程，参观法则适用面最广，几乎囊括所有课程和学堂。不少中等以上的学堂，购置了一定数量的理化器材，有的还设立了专门的理化教室。师范学堂均设有附属学堂，实业类学堂普遍开设实业课程，有的工科实业学堂还自建工厂，建立了自己的实习基地。由于教育出版界的协助，史地等教学挂图被广泛采用。这些方法的实行，改变了传统的文字学习方式，抽象的书面知识转化为某种直观的形式，便于学生理解和接受，也增加了学习的趣味性。与这些基本上在学校空间内采用的方法有所不同，参观法进一步把学生引向大自然，引向社会，使学校与社会相联系，不但使课堂所学与实际事物得到互相引证，而且又能与远足游览相结合，激发了学生的美感，增强了他们的体质，开阔了他们的眼界，却无须增加多少投资，因而在清末的上海很是流行。

## 2、教育机构管理方式的改革

一定的教育机构管理方式取决于一定社会的文化背景和教育机构的规模。中国封建社会在政治上实行专制集权，在一般的人伦关系上片面强调弱者、卑者对强者、尊者的单向服从，因而在教育机构的管理方面逻辑地表现为片面崇奉师道尊严，教师与学生组成管理与被管理泾渭分明的两个方面，管理的依据往往是教师个人的意志与爱好，师生关系一般比较紧张。这些教育机构通常并不具备很大的规模，除教学活动外又几乎很少其它的活动，管理任务因此比较单一，教师和教育机构的主持人往往合二而一，一身二任。

近代中国被迫开关通商以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思想文化一齐涌入中华大地，资本主义所要求的自由通商和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学说与中国传统的人伦观念产生了尖锐的冲突。与此同时，以西方学校为蓝本的近代新式学堂开始诞生，学校日益成为独立的实体，管理任务渐趋繁重。基于传统师生关系和简单管理任务的教育机构管理方式随之发生了变化。上海由于受西方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影响较深，对传统教育机构管理方式的变革也就相应地比较引人注目。这种变革也是在开埠不久以后即发生的，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以规章制度代替主办者的个人意志。这一时期建立的新式学堂，几乎都建立了各自的章程，对学生的品行、学习等作出明确的规定，并公布于校内显著之处，以便对照遵守。其中有些章程还规定了一般教师的职责范围，甚至对学校负责人也有所约束。如上海三等公学和王氏育材书塾都要求教师有事要事先请假，并安排胜任的代课人员；教师之间要互助友爱，合作共事。三等公学更进一步提出：“小学堂以延聘教习、挑选学生为最大关键，总办不得瞻徇妄举。”<sup>①</sup> 颇有点“章程面前人人平等”的意味。二是出现了简单分工的校内管理机构。这一时期上海的新式学堂大都设有校董或校长，作为最高主持人，总管除教学以外的一切事宜，如办学方向、教学计划、师资任免、资金筹措与财务核算等（规模较大的学堂往往设有多名校董），教员负责具体教学任务，初步形成了

<sup>①</sup> 光绪廿二年上海《三等公学总章程》，见上海三等学堂重刻本，1903年。



一种两级分工的简单的学校管理机构。也有个别学堂设有总教习和司事，分管教务和后勤，则其分工稍显细密，学校主持人的职能得到了进一步的分解。三是学生开始间接参加学校管理。如正蒙书院选拔品学兼优的学生担任班长、斋长、学长、协助教师管理同学。王氏育材书塾设有学生正付斋长等。学生小干部的设立，不只是减轻了教师的负担，主要的是锻炼了这些学生的组织能力与社会交往能力，有助于养成近代人必备的素质。

清末之际，上海学堂管理方式发生了新的变化。首先是学校章程中出现了新的规定。最典型的是关于章程修改的程序问题，有的学堂表示：章程如有应行变通之处，可随时提议由监督会同各员妥商酌改。<sup>①</sup>有的学堂宣布：章程如有因时更改之处，当由学堂示明更改缘由，俾来学者知所遵守。<sup>②</sup>“会同妥商”云云，可见不是由长官的个人意见决定；“示明更改缘由”之谓，则显示了对被章程约束者的人格尊重，是要求基于理解的执行，而非盲目的服从。两者都体现了近代民主与法制精神，对理性的尊崇和对封建专制蒙昧主义的背叛。其次是学堂管理机构分工更为细密，除普遍设立学校负责人（称监督、堂长、总理、主任或校长）、教务负责人（称总教习、教务长或教务主任）和后勤负责人（称庶务长、斋务长）以外，还较普遍地新设了各学科或年级负责人（高等学堂称学科科长，中初等学堂称年级主任教员），以及会计、书记、舍监等职，从而形成了以学堂负责人——教务负责人——各学科或各年级负责人——专科教习（员）为一方，和学堂负责人——后勤负责人——会计、书记、舍监为另外一方的三（四）级两方校内管理体系。这种分工细密、逐级负责的学堂管理体系，不仅保证了教育机构的正常运行，而且强化了其独立实体的功能。清末上海有别于整个社会大系统的，具有一定超前性和独立性的校园文化之所以形成，上述学堂管理体系提供了方法与制度上的保证。再次是学生参与管理的方式更为多样。一方面，有更多的学堂在学生中设立了班长、级长、舍长、室长，让学生自己学习管理班级、宿舍和教室的本领。另一方面，出现了学生直接参与校务管理的模式，以爱国学社和中国公学为典型。爱国学社设有学联，每联二三十人，学生可自行选择加入某联，联长公举，凡关于学校兴革之事，多由学联开会议决，交主持者执行。<sup>③</sup>中国公学则更激进，在校内设立了执行部与评议部。其中，评议部为最高立法机关，由学生班长和室长组成，定期开会，有监督单劾学堂教职员之权。执行部成员由学生投票互选，有一定任期，并对评议部负责。<sup>④</sup>应该说，上述两校学生直接参与校务管理，在中国近代政治史上自有其一定的意义，可视为民主政治的一种尝试。但它是以前两校独特的生源和师生关系为前提的。爱国学社的学生以南洋公学退学生以及南京陆师学堂退学生组成，中国公学的同学是激于日本政府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愤而返国的退学留学生，后者有不少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前者亦素受革命党人影响。两校教师即大多由此思想与行为颇为激进的学生中公举产生。换言之，师生之间本无明确界限。因此，两校学生直接参与学校管理实在是个特例，并不具备普遍的意义。从教育角度审视，它甚至并不符合教育本身的规律。因为学生乃在学之人，毕竟以学业为主。如参与校务过多，势必影响其学业，而这是无法持久的。中国公学实行“这种民主共和”制度9个月以后，很快便转向董事

<sup>①</sup> 《宣统三年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章程》。

<sup>②</sup> 光绪卅一年《民立南洋学堂章程》。

<sup>③</sup> 蒋维乔《中国教育会之回忆》，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487页。

<sup>④</sup> 胡适《中国公学校史》，见《胡适选集·历史》，第5-6页。

会主体的制度。其原因，按照胡适的说法，一是生源发生变化，新学生渐多，改变了原先学生与办事人界限不分的情形；二是因迫于经费，须请求官款，不得不避免社会和官方对这种共和制度的猜忌。<sup>①</sup>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还有一条重要原因，那就是教育有其自身的规律，无法违背。如果说爱国学社和中国公学的尝试，在中国独特的历史背景下发挥的主要是进步作用的话，那么承平建设的常态时期再让学生丢弃学业去直接管理校务，就几乎是开历史的玩笑了。半个多世纪后的文革时期工农兵上管改大学，正是这种历史玩笑之一。它从另一个角度提醒人们：教育改革千万不能违背教育规律。

清末上海学堂管理方面还有一项重要举措非常值得注意，那就是住宿制的实行。由于住宿以宿舍和其他相应的物质设施为前提，学校和学生家庭都因此增加了不小的经济负担，清末上海实行住宿制的学堂绝对数并不很多，从目前资料看，大约有 20（所）各左右。其中包括高等学堂（科）4 所（个），普通小学堂 4 所，女学堂 7 所，师范学堂 1 所，初等、高等小学（不含女校）5 所，幼稚园 1 所。但住宿制的重要意义却并不因为住宿学堂绝对数较少而有所减轻。从时间角度分析，住宿制使住宿学生接受近代文化熏陶的时间更多。本来，清末在上海教育机构、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和上述教育机构管理方式方面的改革，已经使清末上海的学生逐步确立起近代形知识结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一种相对独立于整个社会大系统的近代校园文化正在形成之中。清末上海学堂住宿制度一般规定学生一周回家一次，个别学堂如南洋公学附小甚至规定每四周回家一次。这些规定无疑使住宿在近代学堂的学生受到更多的近代文化影响，与社会上腐败现象和不合理现象之间的心理距离更远，因而更富于理想，更敏感，也更容易与旧事物旧观念产生反感与冲突。从空间角度观察，住宿制为住宿学生提供了互相了解、模仿和认同的更为有利的条件。人类原本有互相模仿、认同的本性和需要，学生也不例外。所不同的是，清末上海学生一般地具备了近代的文化知识、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因而他们之间的模仿与认同就必然地带上了近代性质。朝夕相处的住宿学堂生活方式，则提高了彼此的行为透明度，使这种模仿与认同的目标更为明确，更为具体。住宿制的这些特性，使住宿学生比走读学生更容易形成不仅仅是数量集合的学生群体，在近代中国社会内外矛盾的刺激下，更容易参加或发动大规模的学潮、学运和一般的爱国政治运动。清末上海拒俄运动、抵制美约、保路捐款乃至辛亥起义中比较活跃的务本女学、速成女工师范传习所、爱国女学、爱国学社、复旦公学、中国公学、南洋公学等均属寄宿学堂，是为明显例证。

## 六、绵长深远的影响与举足轻重的作用

清末上海教育改革在上海和全国的教育与社会变革史上都具有极其深远的影响与举足轻重的作用。

首先，它完成了开埠以来上海新旧教育变形转轨的历史任务，为民国上海新教育打下了基础。

---

<sup>①</sup> 胡适《四十自述》，第 147 页。

如前所述，早在开埠后不久，上海新教育已逐渐发生了缓慢的变化，教学内容、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和教育机构管理方式等方面都多少不等地进行了一些新教育的尝试。但这些都只停留在局部的量变阶段，远未达到足以动摇旧教育根基的地步。清末上海的教育改革不然。它一方面继承了前此局部变革的近代精神，另一方面大大扩展了改革的范围，深化了改革的程度。它在教育行政方面的变革，导致了独立的地方教育行政体系的诞生，为前此改革所无；它所建立的校内管理体系，也比前此改革中所形成的校内管理机构分工等为细密，级别更为完整。它们改变了传统的中国式政教合一模式，使教育开始成为相对独立的事业，在清末独特的历史条件下，弱化了日益腐败的封建专制末世王朝对教育的干预和控制，强化了地方绅商和进步知识分子对教育的直接影响力，教育因此有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进步因素。它在教育机构方面的变革，与前此仅限于建立个别新式教育机构不同，导致了上海教育结构性的变动，传统的古典式单一教育结构从此演变为多层次多种类的多元化教育结构，上海教育第一次有可能面对近代社会人才的需要，提供多规格的人才群体。它在教学内容方面的变革，确立了近代西学在上海教学领域中的主导地位，将原先传统中学、儒学的一统天下和开埠以后中体西用的教学格局，改变为西主中辅、厚今薄古的课程设置结构，在重建中国文化尚未提上议事日程、适应世界潮流、改造中国成为社会主题的清末时代，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它在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方法和教育机构管理方式方面的变革，将与封建小农经济相适应的小批量人才生产方式，改变为与近代大生产相呼应的大批量人才生产方式，只重机械识记的传统教学方法改变为有益创造性思维和身心健康发展的近代教学方式，传统的不平等的师生关系改变为在学校规章制度面前比较平等的校内人际关系。所有这些，都标志着清末上海业已完成了新旧教育变型转轨的历史任务，有可能给予近代变革与建设事业以强有力的支撑。

清末上海的教育改革，还为民国上海新教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民国期间，上海地方最高教育行政机构开始颁发系列教育法规，对教育事业的管理由事实管理变为法律管理，各学校管理机构趋于统一，学校的层次与种类更为丰富，级际、类际和学科、专业间比例更为稳定与合理，读经讲经基本废止，近代教育内容总体格局开始形成。西方近代新教学法被直接引进。同时，探索有上海特色的教学方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自觉的行为。学生社团与课外活动得到了蓬勃的发展。这些都反映了民国上海教育的新发展。但这种发展不同于清末上海教育之于古典教育。它不是根本性的质的变化，而是量的扩展与充实。在这些发展变化中，始终贯穿着清末上海教育改革的基本精神，保留了政教分离，教育结构的多元化，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育机构管理方式科学化、民主化的基本模式。因此，如果说民国上海新教育是清末上海教育改革的宁馨儿，那是一点也不会过分的。清末上海教育的历史地位实在值得珍视。

其次，上海开始成为全国教育中心，影响了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决策，促进了全国的教育变革。

上海成为全国经济中心，大概在甲午战争之后。上海文化中心的形成，大约在戊戌维新之际。上海作为全国教育中心的地位，则是迟至清末上海教育改革才确立的。它表现在清末上海教育出现了许多全国第一：中国近代第一所体育专门学校、中国第一个私立幼儿师范学校、中国人自办最早的私立大学、中国女子实业教育的发端和中国近代第一个理化器材制造机构等等。

在部颁教材中，上海编写出版的教材比例也雄踞第一，京师和其它兴学较先进的地区均无法望其项背。<sup>①</sup>上海教育中心的形成，还表现在全国各地对上海的仰慕和对这种中心地位的认可。它们或者直接派人来学，如内蒙古卓索图盟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派专人护送学生至上海务本女塾和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求学，皖、豫、闽、浙、赣、湘、桂7省派人来沪学习单级（班）教授法等；<sup>②</sup>或者邀请上海教育界人士去作直接的兴学活动，如江西曾邀沈亮戟去当地帮助改良私塾；<sup>③</sup>或请上海代为起草有关文件，如江苏教育总会之学董会议组织全省学务联合会，委托上海劝学所草拟会章；<sup>④</sup>或将有关原本应设在省会的机构改设在上海，如按清末部章，各省教育会应设在省会所在地，江苏教育总会却设在非省会所在地的上海。诸如此类，均体现了对上海地位的重视。与此同时，上海对自身的教育中心地位也有所自觉，并在行为上开始比较有意识地担负起应有的责任。上海劝学所曾发起松属七邑一厅劝学所联合会议，讨论协调地方教育应兴应革事宜，俨然为地区新教育之首。<sup>⑤</sup>在研究、学习和传播单级（班）授课制方面，上海也颇有领导各省之雄心，有意函请各省教育总会派员来沪听讲，将上海引进的单级（班）授课制轰轰烈烈推向全国。上海教育中心的形成，更表现在对中央教育行政机构的决策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这方面的事例除前述学部发文推广单级（班）授课制外，主要体现为民初学制对清末上海教育成果的采纳。清末上海为更有效地普及教育，曾较普遍地采取缩短修业年限的措施，民初学制则将整个学制年限缩短了3—4年，其中初等小学比癸卯学制缩短1年的做法，和清末上海完全一致。课程设置方面，清末上海的学校除大多不设读经讲经课（科）以外，初等小学堂一般不设历史、地理、格致而增设图画、唱歌、手工课，高等小学堂多增设外文、手工、唱歌课，中等学堂不少增设了音乐课，师范学堂有许多增设了外语、音乐、体育、美术课程。民初学制则除各级各类学校大多不设读经讲经课（科）以外，初等小学校课程亦不设历史、地理、格致，图画、唱歌、手工列为必修科目，高等小学校和中学校均以手工、唱歌（音乐）为必修。<sup>⑥</sup>以上这些级类学校的课程设置，除高等小学不设外文课，几乎全部照搬或参照、发展了清末上海的做法。此外，民初学制对清末上海所没有的若干学校，也依照上海的基本精神对其课程作了变革，如高等师范本科通习课增设英语一科，预科课程增设图画、乐歌2科。<sup>⑦</sup>民初学制对上海教育精神的崇敬，使清末上海教育改革的成果得以直接借助于国家政权和学部法令的力量演化为民初新教育的共同成果，为全国各地所享有。清末上海人对民国教育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再次，培养造就一代新人，促进了上海和全国的社会进步

<sup>①</sup> 《学部第一次审定高等小学暂用书目凡例》，见《学部官报》第21期，光绪卅三年四月十一日，审定书目，第20-26页；《学部第一次审定订中学堂初级师范学堂暂用书目凡例》，见《教育杂志》第2年第9期，第25-30页。

<sup>②</sup> 《（民国）上海县续志》卷9学校上，第9页。

<sup>③</sup> 《江督宪札江西提学使文》，见《江苏江西私塾改良总会文牍》，宣统三年版，第1册，第15页。

<sup>④</sup> 《光绪卅三年十月上海劝学所大会报告》，第3页。

<sup>⑤</sup> 《光绪卅三年十月上海劝学所大会报告》，第3页。

<sup>⑥</sup> 《教育部公布小学校令》（1912年9月），见《教育杂志》第4卷第8号，1912年11月。《教育部公布中学校令施行规则》（1912年12月公布，1914年1月改正第18条），见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编《教育法规汇编》，民国八年版，第183-195页。

<sup>⑦</sup> 《教育部公布高等师范学校规程》（1913年2月），见教育部总务厅文书科编《教育法规汇编》，民国8年版，第230-234页。

清末十年间，上海各级各类新式学堂总共培养了多少学生已难确考。但我们仍可设法通过对某些史料的分析推算获得大致的印象。宣统2年，上海劝学所曾对上海学堂作过一次调查，据调查结果记载，该年上海全县各级各类新式学堂的在学学生约有1万3千多人。<sup>①</sup>这是一个大为缩小的数字，因为有不少学堂没有或难以调查。但在缺乏其它综合性资料的前提下，仍不失其参考价值。按此数推算，清末十年间，上海至少培养了13万多名新学学生。这是上海历史上第一个数量颇为可观的近代学生群体。这些人的个体情况不可一概而论，但在总体上，由于清末上海比较全面的教育改革，他们在知识素养、智能结构、思想倾向、社会联系层面和行为习惯等方面与纯粹封建传统教育灌输出来的士大夫无疑有着天壤之别。他们一般具有了比较好的中外语文、商业和数理化知识，以及一定的历史眼光、全球意识、法律观念和美学修养，而不再是以中国为天下、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以纯粹中国古典文史知识炫耀学识的冬烘先生。他们不但注意书本知识学习，而且一般具备了一定的社会交往能力、组织能力、口头表达能力尤其是当众宣传演说能力，而不再是足不出户、期期艾艾的旧式先生。他们一般倾向于社会变革和进步事业，开始重视普通民众包括妇女大众的生存权利和集体力量，而不再是固守祖宗之道、轻视劳力者和女子的封建文人。他们的社会联系层面一般比较广泛，因为他们接纳了一部分历来社会地位低下的女子、俳优、贫民和孤儿，并且投身于商、学、农、工、军、警、政各界，而不再是封建国家的官吏和这些官吏遥遥无期的候补队员。他们一般采取集团行动的方式，并且往往是和社会各界联合行动，即使是纯粹校内发生的学运，也由于报纸、杂志、传单等大众传播工具的中介而为社会各界所广泛知晓。总之，在清末全面教育改革之后的上海，传统的士的阶层已经消失，新型的近代学生群体正在崛起。近代社会产生了近代教育，近代教育塑造了一代新人，一代新人又通过自身素质的演变影响作用于整个社会，学界与社会各界，教育与社会，正是在这样的双向互动交流中，共同接受了近代文明的神圣洗礼。

然而，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清末上海教育改革亦非例外。它在取得许多堪称杰出成就的同时，也伴随着某些令人遗憾的共生现象。其中最为典型的是传统文化的失落。它表现在前述书院的基本消失和传统课程地位的下跌，也表现在对存古学堂的绝对否定。按清末之际，由张之洞创设的湖北存古学堂于前，陕西、浙江、四川、甘肃、湖北、河北乃至江苏省会继踵于后，颇有一股存古学堂热。这些学堂在当时时代风潮的激荡下，办得并不景气，有些为时并不久长，创办者又往往隐怀挽救封建纲常抗衡新学新风的别样用心。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不能不承认其间多少包含着一些合理的内核。至少它们提出了在引进西方新学、致力社会近代化的同时，如何位置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历史课题。不过清末上海人并不愿意这样看待存古学堂，他们认为：学术须适合时宜，过时的学术不必也无法强存于世。在优胜劣败、崇尚实力甚至崇尚武力的近代世界，中国古代学术已天然处于淘汰之列。保存国粹，不足以补救大局，安全身家。何况清末财力匮乏、科举已废。存古学堂既困于资金、复难得合格学生。学部关于各省必设存古学堂的原议在事实面前也不得不作出退让。提倡保存国粹者其醉翁之意又不尽在国粹本身。各省实在可不设存古学堂。<sup>②</sup>上海人不仅这样说，而且果然付之于

<sup>①</sup> 《宣统二年分上海学堂一览》（庚戌十月止）。

<sup>②</sup> 庄俞《论各省可不设存古学堂》，见《教育杂志》1911年第5期，第47-52页。

行。清末十年间，上海尽管设立了那么多新式学堂，却容不得哪怕是一所存古学堂。上述言行当然不止是针对存古学堂这种独特的学校类型，它们反映了上海人对传统文化的基本姿态。联系到民国肇建至抗战前夕相对承平的数十年间，上海对传统文化的重建依然没有予以充分的重视，传统文化的地位反而因大部分学校经学课的废除继续滑坡的历史场景，可以认为导致上海人对传统文化基本持否定态度的主要原因存在于上海地区本身，即传统文化根基相对薄弱，近代经济和西方实学相对强盛。这种对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对上海教育和人才建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上海的古典人文学科一般不很发达，完全由上海本身培育的学问大家一般也少于国内其他地区。它所值得骄傲的是密切联系社会实际、适应城市建设需求的办学特色，以及相对宽松的地区性小气候对各地各种人才的吸引。这些，使得它在近代中国取得了一种类似于美国教育在世界上的地位。当然，上述令人遗憾之处也一直延续至今，成为今日上海人乃至中国人的困惑之一。

（原载《上海研究论丛》第7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